

# 西安地方志

刑也

周

周公尚書君陳師保萬民民懷其德洛誥惟公德

夏府志卷二十七

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迂衡史記書

武王弟也文王在時旦為子孝篤仁義于

旦輔翼武王九年東伐亞盟津十一年伐

誓破股殺紂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

大及殷民封紂子武庚祿父管叔傅之以

武不豫羣臣懼周公乃自以為贊設三桓

地方志简称「方志」。地方，即地域；志，为「识、记、记述、记载」。『方志』得名，始于西周，《周礼·地官》有「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的记载，汉郑玄注曰：「说四方所识久远之事。」方志编修，自此承传不辍。

地方志历经数千年岁月而经久不衰，虽然从形式到内容，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改变，但其宗旨和基本功能却始终如一。这种世界上独有的民族文化现象，既源于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需要，也源于各个地域的人们对自身历史的重视、珍惜、自豪与反思。



9月5日 省地方志办公室副巡视员李保国、市地方志办公室副巡视员王莹等赴高陵区调研地情网站建设。



9月6日，市委办公厅组织召开《中国共产党西安市地方组织志》编纂工作会议。



市委副书记纪刚讲话，市地方志办区县志处处长王耀珍进行专业指导。会议由市委办公厅副巡视员)吕哲民主持。

# 目 录



2016年第5期  
(总第242期)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 发送对象：

《西安市志》《西安年鉴》承编单位，地方志系统单位、本单位职工及撰稿人等。

## 西安方志文献

- 03 | 《秦地图》
- 04 | 《括地志》
- 04 | 《元和郡县图志》

## 史料钩沉

- 06 | 秦始皇五次出巡
- 07 | 唐代翰林院设有“棋待诏”一职
- 08 | 西安南关教案

## 学术交流

- 09 | 论依法治志 方志从工作向事业转型（摘登）/冀祥德
- 18 | 勋悬日月 名勒春秋  
——唐西平王李晟碑祠墓考 / 文·图 马琦

## 人物春秋

- 23 | 西汉名儒——刘向
- 25 | 西汉古文经学的真正开创者——刘歆
- 26 | 清初著名将领——梁化凤

## 西安风情

- 30 | 西安昆明池
- 32 | 西安大唐芙蓉园
- 34 | 西安人的婚宴

## 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

- 36 | 雁塔棉絮画
- 37 | 周至殿镇八卦锣鼓

## 西安村落

- 38 | 长延堡村



40 | 东三爻堡村

43 | 东三爻村

### ◎ 诗意长安

46 | 柳 / (唐) 李商隐

48 | 岁暮归南山 / (唐) 孟浩然

### ◎ 志鉴动态

50 | 中共西安市委办公厅组织召开

《中国共产党西安市地方组织志》  
编纂工作会议

50 | 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移动地情资料库  
开发与建设项目》建成并通过验收

51 | 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领导调研  
周至县二轮修志工作

### ◎ 字词文化趣谈之典出史籍

05 | 惊弓之鸟

33 | 司马昭之心

49 | 江郎才尽

### ◎ 文苑

52 | 东瀛掠影 / 彭栋为

### 《西安地方志》编辑委员会

主任：曹永辉

副主任：姚敏杰 张 帆

王 莹

委员：崔义萍 杨军亚

高长安 姚文东

崔桂琴 王耀珍

高 鹏

### 《西安地方志》编辑部

主 编：王 莹

副 主 编：高长安 宋亚颖

责任编辑：宋亚颖 闵莎莎

主办：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编辑：《西安地方志》编辑部

地址：西安市凤城八路 109 号  
市政府大院 26 号信箱

邮编：710007

西安地情网：[www.xadqw.cn](http://www.xadqw.cn)

西安市地情资料信息中心  
基础数据库

<http://www.xadqw.cn>

[/difangzhinew](http://www.xadqw.cn/difangzhinew)

[/index.jsp](http://www.xadqw.cn/index.jsp)

E-mail: [changannan6861@sohu.com](mailto:changannan6861@sohu.com)

[xadfz@sina.com](mailto:xadfz@sina.com)

电话：029-86788731



**编者按：**

西安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方志编纂在此同样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

地方志历经数千年岁月而经久不衰，虽然从形式到内容，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改变，但其宗旨和基本功能却始终如一。这种世界上独有的民族文化现象，既根源于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需要，也根源于各个地域的人们对自身历史的重视、珍惜、自豪与反思。

“方志”得名，始于西周，《周礼·地官》有“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的记载，汉郑玄注曰：“说四方所识久远之事。”方志编修，自此承传不辍。历代帝王将相、州县主官，无不以修志为重要政务，竟至旧时民间有“七品县令三件事：收税、断案、修县志”之说。新官到任，首索志书，几成惯例，传为美谈。

古都西安，物华天宝，人文荟萃；历代方志，新编志书，莘莘大观。今天，中共西安市委、市政府在初步建成具有历史文化特征的国际化大都市的关键时期，进一步提出了全力打造“品质西安”的奋斗目标。“品质西安”包含内容诸多，文化内涵是一个重要方面。为此，我们特开设“西安方志文献”栏目，连续刊登、介绍西安地域历代方志文献，以期使读者了解西安地域方志编纂的成就与历史，体味西安的内在品质；更为有兴趣和有志于西安地情研究的人士铺设一条连接历史与今天的小径，开启一扇立足今天而回望历史的窗口。

## 《秦地图》

《秦地图》，久佚，今有清人王谟《汉唐地理书钞》辑本。王谟，江西金溪人，乾隆四十三年（1768）进士，毕生致力于搜集考订工作，著作颇丰。其编纂的《汉唐地理书钞》以地理书别为1门，辑汉唐地理遗书达500种，完成刊刻流传至今者犹达70种之多。在该书中，王氏引历史记载3条。一为《史记·萧相国世家》载：“沛公至咸阳……（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二为班固《汉书·地理志》“琅琊郡”条下注：“平昌，长广，

有莱山祠。奚养泽在西，《秦地图》曰：‘剧清池，幽州薺’。”三为《汉书·地理志》“代郡”条下注：“《秦地图》书班氏。”另据清人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遗》考证，此书“东汉时尚存，及魏晋时，裴秀称官府无秦图，则大抵亡于董卓、（李）傕、（郭）汜之乱”。由此可见，《秦地图》有图有记，记载了天下户口、民所疾苦、阨塞之所、强弱之处、郡县山水等，系隋唐图经的开山之作。故近代方志学家张国淦所著的《中国古方志考》将《秦地图》列为开卷之首。





## 《括地志》



《括地志》，又名《魏王泰坤元录》《贞观地记》《贞观地志》《魏王地记》《括地象》，唐李泰主编，萧德言等修撰。唐贞观十六年（642）成书。全书正文550卷、序略5卷。李泰，唐太宗第四子，雅好文学，工草隶，集书万卷。《括地志》体例吸收《汉书·地理志》和顾野王《舆地志》两书之长，为唐宋总志体例开了先河。其内容则按当时的都督

府区划和州县建置，博采经传地志，旁求故志旧闻，详载各政区建置沿革及地望、得名、山川、城池、物产、古迹，风俗、人物、掌故等，征引广博，保存了许多六朝地理古籍中的珍贵资料。孙星衍云：“其书称述经传，山川城冢，皆本古说，载六朝时地理书甚多，以此长于《元和郡县图志》而在其先。”（《孙渊如外集》卷三）唐宋时著作多征引此书疏证诠释地理。南宋后散佚。清人孙星衍将唐宋人著作中征引的《括地志》遗文辑为8卷，收入《岱南阁丛书》。后来朱记荣《槐庐丛书》又附辑陈其荣补辑遗文5条，曹元忠《南笥札记》本也补辑数条。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辑校本又从日本《史记会注考证》引《史记正义》，从《通典》《初学记》《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长安志》《大藏音义》等古书补充辑录10余条，编成《括地志辑校》，是迄今最完整的辑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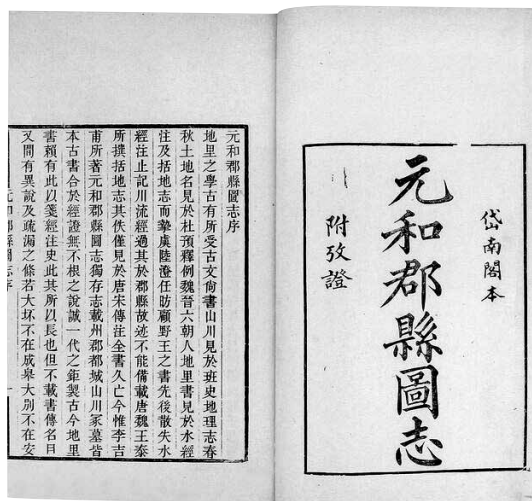
## 《元和郡县图志》

《元和郡县图志》，唐李吉甫撰，元和八年（813）成书，40卷。李吉甫，赵郡（今河北省赞皇县）人，唐代皇族宗室，唐朝名相；宪宗时入为翰林学士、中书舍人。该书记述内容起于京兆府，终于陇右道，共47镇，每镇篇首有图，下为文字记述。至宋代因图亡佚，遂改称《元和郡县志》。元、明以后文佚6卷，另3卷各佚文半卷。后来清代严观有《元和郡县补志》9卷，缪荃孙有《元和郡县志缺卷逸

文》3卷。该书分镇记述唐代各府、州、县的户口、沿革、山川、河流、道里、贡赋等，对长安及关中地区的地理沿革、历史遗迹、宫观苑囿等记述尤详，对万年、长安两县的地理山川均标明位置及方向距离，每一县下注明历史沿革和县治迁徙，并增加经济地理内容。在魏晋以来的总地志中，《元和郡县图志》不但保留至今最古老的一部，也是编写最好的一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舆地图经，



隋唐志所著录者，率散佚无存；其传于今者，惟此书为最古，其体例亦为最善，后来虽递相损益，无能出其范围。”《元和郡县图志》问世以后，主要依靠传抄得以行世。宋时的刻本、抄本亦失传。明代各本大多为抄本，且卷数不尽相同。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天一阁文物保管所有藏。清代的版本则较多，出现过上至皇家、下至私人刊刻的多种版本。以《四库全书》本、乾隆四十八年（1773）武英殿本、嘉庆元年（1796）孙星衍《岱南阁丛书》本、光绪六年（1880）金陵书局刊刻本、光绪八年（1882）金陵书局重刻本、光绪十二年（1887）王灏《畿辅丛书》翻刻本、光绪廖荃孙辑《云自在龕丛书》收入《元和郡县志阙卷逸文》等影响较大。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



《元和郡县图志》贺次君校点本，2008年中华书局出版《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收录。

字词文化趣谈之典出史籍

### 惊弓之鸟

“惊弓之鸟”其实原指以巧制胜，现用来形容受过惊恐的人碰到一点动静就非常害怕。它启示我们做人做事要光明磊落，品行端正，方能心安理得，问心无愧。“未作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战国时，魏国有一个叫更羸的射箭能手。有一天，更羸与魏王在京台之下，看见有一只鸟从头顶上飞过。更羸对魏王说：“大王，我可以不用箭，只要把弓拉一下，就能把天上飞着的鸟射下来。”“射箭能达到这样的功夫？”魏王问。更羸说道：“可以。”说话间，有雁从东方飞来。当雁飞近时，只见更羸举起弓，不用箭，拉了一下弦，随着“咚”的一声响，正飞着的大雁就从半空中掉了下来。魏王看到后大吃一惊，连声说：“真有这样的事情！”便问更羸不用箭怎么将空中飞着的雁射下来的。更羸对魏王讲：“没什么，这是一只受过箭伤的大雁。”“你怎么知道这只大雁受过箭伤呢？”魏王更加奇怪了。更羸继续对魏王说：“这只大雁飞得慢，叫得悲。”更羸接着讲：“飞得慢是因为它身上的箭伤在作痛，叫得悲是因为它离开同伴已很久了。伤口在作痛，还没有好，它心里又害怕。当听到弓弦声响后，害怕再次被箭射中，于是就拼命往高处飞。一使劲，本来未愈的伤口又裂开了，疼痛难忍，再也飞不动了，就从空中掉了下来。”

后来用“惊弓之鸟”比喻受过惊吓的人遇到类似的情况就惶恐不安。





秦皇島因公元前215年秦始皇东巡到此拜海求仙并驻蹕于此而得名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为了加强和巩固统治，曾利用修筑的驰道“亲巡天下，周览四方”，到全国各地去炫示他不可一世的皇威；同时借机寻仙访道，觅求长生不老的仙药，企望千秋万代做天下的主人。于是就有了五次出巡。

第一次是公元前220年，从咸阳出发，西行经陇西郡、北地郡，直达泾水上游的鸡头山(今甘肃平凉西)，然后过回中(今甘肃平凉北)，回到咸阳。

第二次是在公元前219年，从咸阳出发，经渭水南岸东行，经雒阳、荥阳，直达邹峰山(今山东邹县南)，又登泰山，行封禅礼；登之罘(今山东芝罘半岛)，至琅邪，刻石颂德；西行经彭城、衡山、南郡至湘山，最后取道汉水回到咸阳。

第三次是在公元前218年，从咸阳东行至阳武博浪沙(今河南中牟县北)遇到张良及其力士的阻击，因为掷椎“误中副车”，始皇幸免于难。由于受此虚惊，行至琅邪、上党后，返回咸阳。

第四次是在公元前215年，从咸阳东行至碣石(今河北乐亭附近)，刻石纪功，又经右北平、上谷、代雁门(地名，代地雁门郡)、云中，由上郡返回咸阳。



## 秦始皇的五次出巡

第五次是在公元前210年，从咸阳出发，经武关，沿丹水、汉水至云梦(今武汉市附近)，再沿长江东下，经钱塘(今浙江杭州市)、狭中(今浙江富阳县附近)，登会稽山，祭大禹，刻石留念。返回至沙丘平台(今河北巨鹿东南)，始皇病死。

关于秦始皇五次出巡全国的目的，历史学家普遍认同的主要在以下几点：第一政治目的为先，统一伊始，黔首未集，巡行郡县，扬秦始皇功德，显示其强大，威服四海。第二求仙神及长生不老之药，秦始皇偏信卢生等人的谎言，晚年迷信神仙，自称真人，放弃“朕”自称，反复几次出巡均去东海一带，为冀得仙人、仙药，以期长生不老。第三在出巡中考察各地民情，整齐四方风俗，用封建大一统思想强制改造地方陋习，固执封建统治和社会的安定。

也有学者认为，秦始皇频繁出巡除其政治目的外，也与秦人的文化传统及秦始皇本人的个性特征有关。秦人好慕远行，有其悠久的文化传统。

虽然五次出巡的目的各异，因其出巡耗费资财人力过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为日后埋下了祸患。比如，秦始皇到会稽游玩，驾大船渡浙江，项羽与项梁一起观看，项羽对项梁说：“彼可取而代也”，即秦始皇是可以被取代的。此话不想成真，项羽最终的确成为了灭秦的主力军。





唐代翰林院设有「棋待诏」一职

春秋战国时期，围棋已广泛流传，时人常以棋喻事。孔子、孟子都曾论及。汉代，士大夫阶层及宫廷贵族乐于此道，女子开始参加围棋活动。晋葛洪《西京杂记》载：“杜陵杜夫子善弈棋，为天下第一人”；“戚夫人侍高帝”曾“竹下围棋”。班固著《弈旨》，是保存下来的最古老的围棋理论著作。班固的学生马融因棋艺造诣颇高，收徒千余人。东汉以后，围棋衰落，有绝迹之危。班固在《原弈》中叹曰：“今博行于世而弈独绝。”

唐代开始设有“棋待诏”一职，与“画待诏”、“书待诏”同属翰林院，用以招揽国内（甚至包括国外）的围棋高手。唐朝的帝王多爱好围棋，这是棋待诏产生的重要原因，也是文武官员以及平民百姓普遍爱好围棋的原因之一。

《旧唐书·职官制》说，“中书省”下的“翰林院”设有待诏，备皇帝召用，其中有棋待诏，官阶九品。所谓“棋待诏”就是等待皇帝的召见，专门陪皇帝、妃子和王子、公主下棋的职业棋手。而这些供奉内廷的职业棋手都是从为数众多的“业余”棋手中经严格考试后才入选的。因他们都具有第一流的棋艺，故有“国手”之称。《新唐书·百官制》中就记载，宫廷的“万林内教坊”设有博士十八人，其中就有一名棋博士。棋博士和棋待诏的设立，是我国历史上由官方设立职业棋手的最早先例。

棋待诏的设立可以分为形成期与固定期两个阶段。唐玄宗以前，棋手候命于翰林院，等待天子宣召，并无官称。玄宗时才正式定为官职，即“棋待诏”。这种官职没有品秩，属于使职差遣之类，在翰林院中的地位比较低微。著名的棋待诏，有唐玄宗时的王积薪，唐德宗时的王叔文，唐宣宗时的顾师言，唐僖宗时的滑能等。

棋待诏的棋艺活动，不仅仅是陪侍皇帝下棋，局限在宫廷的小圈子里与世隔绝。他们还从事以下几方面有意义的活动：

一、外交活动，如顾师言，接待日本国王子，切磋棋艺，成为中日围棋交流史上的佳话。《旧唐书》载：唐宣宗“大中二年（848）三月己酉，日本国王子朝贡方物，王子善棋，帝令棋待诏顾师言与之对手。”这是一次中日之间的围棋对抗赛。由于水平相当，“至三十三下，胜负未决，师言惧辱君命，而汗手凝思，方敢落指。”经过苦战，“王子瞪目缩臂，已伏不胜”，顾师言取得最后胜利。《旧唐书》亦载：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因新罗国（今朝鲜）国王兴光逝世，派遣左赞善大夫邢寿吊祭，随行的还有围棋高手杨季鸾。在吊祭期间，杨季鸾与新罗棋





## 西安南关教案

这是发生于20世纪初的西安人民反洋教运动。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美国协同会差会在西安南关围墙巷基督教堂东修建“使徒学堂”(西教士子女学校)。一次，该学堂装修校舍，丢了一些断椽木屑等建筑垃圾，学堂的洋人便责斥维持当地治安的咸宁县姚成和南关警察分局胡重没有尽到责任，并限期办案。最后姚成和胡重将失物追回还给洋人，洋人又借偷窃之名讹诈附近居民，索赔不止。加上住在这里的洋人平时对周围群众多有凌辱，所以积怨甚深。

宣统三年(1911)，西安起义提出“兴汉灭洋”的口号。在这一口号影响下，姚成和胡重想到了7年前饱受洋人欺凌的事情。遂于9月2日晚召集南关万顺店、鸿盛店的客人(多为帮

会成员)，联络南关一带的青壮年约千余人，手持梭标棍棒刀枪，高喊“铲除教堂”、“杀死洋人”的口号，对美国协同会“使徒学堂”进行围攻，以“湔耻雪恨”。围攻初期，在围攻人员还没有靠近学堂时，学堂中就射出子弹打伤群众数人，更加激起了民愤，他们推倒麦秸垛，焚毁学堂大门。当时火光冲天，喊声雷动，几个冲出来奔命的洋人被愤怒的群众当即打死，躲在院子的也被搜获打死，负责学堂的牧师白锦荣(美国人)越墙逃往西关美协同会总堂。事后，美国向陕西军政府施加压力。陕西都督张凤翔慑于帝国主义的强权压力，派兵搜捕所谓的肇事者，杀了姚成、胡重等人，赔款五千两白银，拨款在西关建“忆使徒学堂”，并为在事件中丧生的白玉林等洋人修坟立碑。

真乃国弱民辱。

手对弈，“大为蕃人所敬。其国棋者皆在季鸾之下，于是厚赂金宝及药物等。”

二、参加公开的棋会和比赛。如王积薪，曾在燕公张说家、太原尉陈九言“金谷”园，与好手对局，对社会产生很大影响。

三、著书立说，弘扬棋道。比如，王积薪就著有《十诀》《金谷园局谱》《棋势谱》《凤池图》等。其中的《十诀》：一、不得贪胜。二、入界宜缓。三、攻彼顾我。四、弃子争先。五、舍小就大。六、逢危须弃。七、慎勿轻速。八、动须相应。九、彼强自保。十、势孤取和。仅仅用了四十个字，就以极其简练的口号，高度概括了围棋的基本理论和实战中的战略战术，其影响十分深远，自唐以后的历代棋手，莫不以它为座右铭。

棋待诏的设立，大大提高了棋手的社会地位。在科举考试之外，士人和平民又多了一条晋身之阶，有许多人倾毕生之精力研究棋艺，成为职业棋手。

唐朝以后，宋朝仍设有棋待诏。明、清两朝的翰林院虽置有“待诏”，但已不见“棋待诏”这种名目。由此可见，棋待诏始于唐朝而终于宋，一直延续了500余年，对围棋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 论依法治志 方志从工作向事业转型

## （摘登）

冀祥德

### 一、依法治志的提出

依法治志是伴随着我国从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到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调整，从地方志“一本书主义”逐步发展形成的；依法治志是伴随着地方志从一项工作到一项事业的定位升级，由依法修志逐步发展形成的。依法治志的提出，是公平有序的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内生性要求，是地方志活动发展的历史趋势与必然规律。

（一）从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略）

（二）从依法修志到依法治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为了确保地方志事业不断繁荣发展，稳步推进，地方志工作由行政推动走向依法修志，再到依法治志。1996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志编纂工作的通知》，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工作步入

制度化阶段。在此明确了地方志工作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中的地位，完成了省、市、县三级志书体系的建构，确定了志书“每20年左右续修一次”的国家要求，提出了建立一支德才兼备的修志工作队伍，以及制定和完善有关规章制度的工作要求。这对于促进我国地方志工作尤其是新方志编修工作的制度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地方志的编纂是政府通过行政命令和行政手段组织实施，在解决问题的重点、领导的主观意志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导致了地方志工作区域发展不平衡。另外，由于地方志工作受机构及领导调整的影响较大，同一基层政府的修志政策也存在不连贯、不协调，甚至不一致的现象，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地方志工作的顺利开展。

2006年5月18日，国务院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有关地方志的全国性法规，结束了地方志工作无法可依的历史，标志着地方志编修工作从此进入有法可依、依法修志阶段。



依法修志是在地方志工作无法可依，只能靠行政手段来开展工作时，通过《地方志工作条例》的颁行来实现有法可依。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地方志工作条例》在地方志活动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但随着地方志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地方志工作条例》的不适应性逐步凸显：一方面，社会实践的发展与需求对地方志事业的内容及方式提出了更高要求；另一方面，地方志事业经过多年人才积累、使命提升，已经具备了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条件。近年来，地方志活动正在进行着以下几个转变：第一，从平面的修志“一本书主义”向立体的修志、读志、用志等多业并举转变。地方志不再是“沉睡的书”，更是“活着的精神”。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间，我国新编地方志工作重新起步，地方志工作的重心是修志，然而，地方志的生命不仅体现在对于文明的记述与传承，更在于为社会发展大局提供服务。目前，充分挖掘、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是推动地方志事业发展的工作重点。第二，从一项工作向一项事业转变。工作，是为谋生而从事的体力或者脑力劳动；事业，是人所从事的，具有一定目标、规模和系统而对社会发展有影响的经常活动<sup>①</sup>。经过多年发展，地方志不仅仅是为谋生而从事的体力或者脑力劳动，而且已经成为全体方志人“修志问道，以启未来”的事业，这一事业更包含着巨大的时代担当与历史使命。第三，从政府主导向政府支持、社会广泛参与转变。地方志事业不仅仅是政府机构的工作，也需要社会的广泛参与，从而更进一步发挥志书在存史之外的资政、育人功能。而实现

这样的转变，依法修志已经严重不适应，必须走向依法治志。

总之，随着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深入发展，依法修志已经完成了其使命，内外因素推动下有了升级到依法治志的迫切需要。换言之，依法治志是依法修志发展的基本目标。

《规划纲要》的出台，标志着地方志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从依法修志向依法治志的现代转型，是和我国与时俱进的法治国家建设进程相适应的。正如2015年12月29日刘延东副总理在接见全国地方志系统先进模范代表时讲话中所言，地方志工作要“紧跟时代步伐，勇担历史使命，忠实记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辉历程和丰功伟绩，翔实记载中华民族走向复兴、实现中国梦的伟大进程”<sup>②</sup>。

## 二、依法治志的价值

依法治志的提出，不仅是一个概念的变化，其蕴含了深刻的价值，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在我看来，依法治志的价值至少体现于如下几个方面。

### （一）依法治志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的法治基础与保障。“法治不仅是西方社会的治理模式，同样也是现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必然选择。”<sup>③</sup>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就要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使我国国家治理的各个方面

都进入法治化轨道。依法治志是在当前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背景下提出的，它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之意，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是依法治国在方志领域的具体展开；同时，依法治志中独特的存史、资政、育人功能，对依法治国的实现也有积极推动作用和记载传承功能。

（二）依法治志是地方志定位转型的根本保障

对照《地方志工作条例》和《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之名称，可以发现，在对地方志的定位上，有了从“工作”到“事业”的变化。把地方志定位于一项工作与定位于一项事业显然是有本质区别的。地方志想要实现从一项工作到一项事业的定位转型，离不开依法治志的法治保障。要实现地方志转型发展，必须将地方志事业纳入法治化轨道，在识志、修志、管志、用志等方面形成法治秩序，使志书能更好地发挥存史、资政、育人作用，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局，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局。

（三）依法治志是依法修志发展的基本目标

要正确认识依法治志与依法修志之间的关系，依法治志不是对依法修志的否定，也不意味着当初依法修志提法错了。依法修志是在地方志工作无法可依，只能靠行政命令、行政手段来开展时，伴随着《地方志工作条例》的颁行而产生的，这也是《地方志工作条例》对地方志工作的最大贡献。但是随着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时代要求，依法修志已经不适应

我国新方志事业发展需要，需要升级发展到依法治志。所以，依法治志不是对依法修志的否定与“抛弃”，而是对依法修志的发展与“扬弃”，是依法修志的升级版。

（四）依法治志是加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保障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加强重点领域的立法，“建立健全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遵循文化发展规律、有利于激发文化创造活力、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文化法律制度”。地方志是记载一个地方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历史和现状的资料性文献。2014年4月，刘延东副总理强调，要把地方志“作为文化强国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sup>④</sup>。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我国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治志的提出符合党中央关于加强文化法治建设和重视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立法工作方略、方针的要求，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法治化，推动我国国家文化建设的发展。

### 三、依法治志的内涵与外延

从依法修志到依法治志的转变，绝不只是从“修”到“治”的文字转换，无论其内涵还是外延，依法治志都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依法修志。

（一）依法治志的内涵

依法治志就是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形势





下，以“一纳入，八到位”为总要求，使地方志从传统单一的依法修志向依法识志、依法修志、依法研志、依法用志、依法管志、依法存志和依法传志转型发展。

依法治志的基础在于形成符合地方志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并能有效保障地方志事业顺利开展与发展，层次分明、配套合理的地方志法律体系。依法治志最基本的标志是，建立完备的地方志法律体系和完善的相关配套体制机制，最终目的是使与地方志相关的法律能够在地方志事业的各个方面得到普遍、切实地制定并遵守，实现地方志事业的法治秩序，其核心在于逐步实现地方志事业发展的常态化、制度化、法治化。

## （二）依法治志的外延

从依法治志的内涵中可以看出，依法治志的外延包含了依法识志、依法修志、依法研志、依法用志、依法管志、依法存志和依法传志七大方面。

### 1. 依法识志

依法识志就是怎样认识和定位新时期的地方志。一方面，要从历史的考察中找寻地方志的社会地位。“志者，所以志一代之典章因革废兴，上以备太史之采风，下以存乡邦之掌故，使后之人征文考献观法有资。”<sup>⑤</sup>另一方面，要从实践中，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过程中，来总结、凝练和定位新时期的地方志工作机构和地方志工作者。志书作为官修权威资料，起着重要的存史、资政、育人作用，“直笔著史，彰善引风气，为当代提供资政辅治之参

考，为后世留下堪存堪鉴之记述”<sup>⑥</sup>，阐明了地方志工作者作为史官、史家的定位。地方志工作者在历史上是史官的地位，在当今现实中应当是史家的定位。

### 2. 依法修志

依法修志是指构建科学完备的依法修志体系。主要包括：第一，确定修志主体及其职责，依法确定各级政府在地志编纂等方面的职责；第二，确定修志队伍的构成，地方志编纂人员实行专兼职相结合，专职编纂人员应当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并吸收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参与；第三，确定地方志资料收集程序与方法，依法开展地方志资料收集，防止职责履行不到位、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等行为；第四，依法保障地方志编修人员的合法权利，包括物质保障与精神保障两个层面，以及应有的署名权等著作权中的人身权与财产权。

### 3. 依法研志

我国的修志传统虽然源远流长、赓续不绝，但方志理论研究和方志学学科始终未获得应有的学术地位。依法治志提出后，对于方志理论研究的要求会越来越高，要求方志学者既要运用新理论、新方法，进行综合性、多学科交叉的深入研究；又要摆脱以往封闭的研究思维与羁绊，在做好传统方志理论研究的同时，创新研究理念，研究地方志转型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思路、新措施，着力推动方志学学科地位提升。

### 4. 依法用志

依法用志是指依法对地方志资源的开发利用。地方志工作应当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全面发



展服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有责任积极开拓社会用志途径，通过建设资料库、网站、微信、微博等多种方式，加强地方志工作的信息化建设，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利用地方志资源提供便利。组织开发利用方志资源，着力构建读志用志体系，发挥其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功能是整个地方志事业的核心和归宿。坚持依法用志，就是要转变思想观念，发挥资源优势，积极探索用志途径，拓宽用志新领域，为领导决策服务、为公众服务、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 5. 依法管志

依法管志是指依法进行志书的审查验收、编辑出版、保存管理、督导检查，以及依法规范治理各类地方志活动，研究各类地方志违法行为。首先要依法确定工作主体，合理配置权力结构以及工作职责；其次要依法确定工作程序，做到权力制约、职责到位、程序有效、监督有序。《规划纲要》提出的地方志编修、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质量保障、资源开发利用、工作保障五大体系，主要就是从依法管志的角度设计的，确保地方志事业发展有制度、有规范，体系化。坚持依法管志，就要求各级党委政府、社会机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积极配合和支持地方志工作，不管是资料搜集还是机构人员配备等。“对地方志书进行审查验收，应当组织有关保密、档案、历史、法律、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专家参加”<sup>⑦</sup>，若不配合、不作为，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要把各类地方志违法行为纳入法治调整范围，依法查处，确保地方志活动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 6. 依法存志

依法存志是指除了传统志书年鉴的存储外，还应包括地方志书编纂过程中基本资料的留存、相关机构的收藏利用，以及与现代信息技术相结合的数字化存储。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推出的“全国信息方志与数字方志建设工程”，其核心内容是“三网一馆两平台”，“三网”是指中国国情网、中国地情网、中国方志网。其中，中国地情网就是各地地情的纵向排列；中国国情网是把各地地方志、年鉴中的地情资料全部数字化，按照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五大部类，把全国的信息整理横排；中国方志网是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官方门户网站；而中国地情网、中国国情网和中国方志网的依托就是国家数字方志馆。在完善原有地方志传统保存模式的同时，进行数字化、现代化地保存。

#### 7. 依法传志

依法传志不仅是指对我国修志传统及其成果从古至今的传承，还包括将中华民族这种独特的文化传统薪火相传、代代相济；不仅是指将方志文化在中华大地传扬，还包括将中国方志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日前，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推出“中国方志文化走向世界工程”，其意义就在于此。

### 四、依法治志的目标

与依法修志相比较，依法治志与依法治国的关系更加密切，与国家与社会发展的中心任务更加契合，对社会的关注度和影响力更加提



升，地方志事业的目标更加远大。概括而言，依法治志的目标就是通过“七个转变”，实现“七化”目标，确保地方志事业全面、协调、创新、持续发展。

（一）从单一修志转变为多业并举，实现地方志事业的全面化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地方志事业的发展，传统意义上修志的内涵大大拓展，地方志工作已经不仅仅指编纂志书，而是包含了方志事业的管理和开发利用等一系列行为。正如朱佳木同志所说：“地方志工作并不仅仅是编书，尤其不是编一部书，而且是以编纂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为中心所进行的组织管理、理论研究、编纂指导、审查验收、开发利用等一系列工作。”<sup>⑧</sup>坚持依法治志，就是应当实现地方志由单一编纂志书到志、鉴、馆、网、库、刊、用、会、研、史等多业并举的转变，彻底摒弃“一本书主义”，实现地方志事业的全面发展。

（二）从依靠行政命令转变为依据法律法规，实现地方志事业的法治化

“地方志工作涉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仍靠过去的行政命令方式组织编纂地方志，已难以适应形势的需要。”<sup>⑨</sup>将地方志工作纳入依法治志轨道，通过法律形式来确定地方志的性质、原则、任务，地方志机构的设置及其职责，地方志主体的权利与义务，有关机构与人员地方志职责，以及违法责任等，才能规范各类地方志行为，保障地方志活动沿着正确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理论上，应该从依法治国的高度把握依法治

志的内涵与外延，改变传统地方志观念，更新地方志思维，用新的地方志理论指导地方志活动从行政化转向法治化。

（三）从地方志系统行为转变为国家社会责任，实现地方志事业的社会化

地方志事业是一项浩大而复杂的社会文化系统工程，只有在党委政府的重视支持下，全社会齐抓共管，才能实现“为当代提供资政辅治之参考，为后世留下勘存勘鉴之记述”的历史使命。实施依法治志，就是转变对地方志的定位认识，改变地方志活动是地方志工作机构职责的观念，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地方志工作机构组织实施、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地方志事业格局，把地方志活动从狭隘的地方志系统行为转变为国家社会行为，实现地方志事业的社会化。

（四）从一个职业转变为一个专业，实现地方志事业的专业化

职业，是“个人在社会中所从事的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工作”<sup>⑩</sup>；专业，是“具有专业水平和知识”“专门从事某种工作或者职业”<sup>⑪</sup>，换言之，专业是需要特殊的智力和过程培养与完成的，能够提供专门性社会服务的一种专门技术职业。以志鉴编纂为代表的地方志活动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不是任何人都可以从事并胜任的。依法治志要求地方志活动应该从一个职业向一个专业转变。地方志的专业化要求，要从逐步建立地方志专业准入制度开始，不断提高地方志从业门槛，通过创新地方志人才培养机制等，实现地方志事业的专业化。



(五) 从修志为志转变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实现地方志事业的功能化

虽然近些年来, 地方志的存史、资政、育人功能不断被强调, 但是人们对地方志功能的认识还是集中于存史, 对其资政、育人功能认识严重不足, 而且一些地方志工作机构和地方志工作者, 也多是只管埋头修志, 缺乏围绕国家、地区、系统中心工作开展地方志活动的思维。依法治志要求地方志工作必须创新, 要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 主动服务, 主动作为, 尤其是要找准切入点和结合点, 把地方志事业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工作中, 深入挖掘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 充分发挥地方志为国家战略以及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功能。

(六) 从三级学科转变为一级学科, 实现方志学学科的独立化

一般认为, 方志学在我国学科门类中是历史学下的三级学科; 关于方志学是否是, 以及是否应当成为独立学科, 方志学理论界一直见仁见智, 即使对于方志学从属于哪个一级学科, 也有“历史学说”“地理学说”和“史地同属说”之争, 至今没有形成通说。这种理论研究状况,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地方志事业的发展, 至少是对地方志事业创新发展引领不够、指导不力。方志学理论界对方志学学科定位尚且不明, 实践中地方志工作被边缘化也就不足为奇。我认为, 地理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等学科与方志学都不是种属关系, 在依法治志理论体系下, 方志学应该成为我国一个独立的一级学科, 并应建构其完

整的二级学科和三级学科。由于篇幅所限, 在此不展开论述。

(七) 从方志人精神的普适化转变为方志人精神的个性化, 实现方志人定位的精准化

一般认为, 《规划纲要》颁行前, 方志人精神是“淡泊名利, 甘于奉献, 恪尽职守, 锲而不舍, 开拓进取”。这一方志人精神, 不仅没有提炼出方志人精神不同于其他行业人员精神的独特性, 也没有表达出方志人自古以来独有精神内核的传承性, 而且具有其他多种行业均可共享的普适性。《规划纲要》将“修志问道, 直笔著史”规定为方志人精神, 既实现了方志人精神从普适化到个性化的转变, 又实现了方志人独有精神追求的可传承性, 尤其是对方志人“直笔著信史, 彰善引风气”的精准定位。

## 五、依法治志目标的实现路径

研究依法治志, 不仅要在解读其内涵与外延的基础上建构其目标, 还要在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体目标下, 探寻依法治志目标的实现路径。总体来说, 依法治志目标的基本路径, 要遵循依法治国目标的基本路径, 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新要求, 从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方面予以规划设计。

(一) 科学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法》

健全的地方志法律体系是依法治志的前提条件。《地方志工作条例》颁行后, 对地方





志工作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10年来，地方志理论与实践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伴随着地方志从一项工作向一项事业的转型，

《地方志工作条例》在法律效力位阶，地方志定位、原则及任务，地方志工作机构的设置及其职责，地方志主体的权利与义务，有关机构与人员的地方志职责，以及地方志违法责任追究等方面存在不适应，需要按照科学立法的要求，以《地方志工作条例》和《规划纲要》为基础，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法》（以下简称《地方志法》）。

我认为，制定《地方志法》要处理好几个关系：一是《地方志法》与宪法的关系。《地方志法》立法必须以宪法为根据，不得与宪法相抵触。二是《地方志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关系。《地方志法》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保持一致，避免同法律体系内其他法律法规发生矛盾和冲突。三是《地方志法》与地方志地方性法规、规章的关系。要通过《地方志法》的制定，形成法律效力位阶递进、层次分明、结构严谨科学的地方志法律体系，并使得地方志法律体系尽可能涵盖地方志事业的各个方面，实现地方志各项工作都有法可依。四是制定《地方志法》与修改地方志地方性法规的关系。制定《地方志法》的同时，要研究地方志地方性法规的修改，实现地方志法律体系的协调一致与上下贯通。

#### （二）严格执行地方志法律法规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如果有了法律而不实施，或者实施不力，搞得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那制定再多的法律也无济

于事。”<sup>⑩</sup>因此，依法治志的实现，不仅仅有科学立法的问题，还有严格执法的问题。地方志工作中严格执法的内容包括：其一，各级政府、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及个人，要严格遵守地方志法，积极履行地方志义务，实现有法必依；其二，地方志工作机构要严格依照地方志法组织地方志编纂、管理、使用，克服地方志编纂、管理、使用的随意性和主观性，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其三，对于各类地方志违法行为，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要依照地方志法予以查究，严厉查处地方志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把依法治志的重心落在执行上，体系性地理解法治概念。

#### （三）积极推动地方志活动司法化

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以来，地方志活动的行政化特征明显。依法治志理论要求地方志活动应当从行政化转向法治化。地方志活动法治化除去科学制定地方志法、实现有法可依，严格执行地方志法、实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之外，还要实现地方志活动的司法化。地方志活动的司法化主要是指在地方志纠纷处理以及地方志违法行为查究中，建构地方志司法程序，把地方志活动纳入公正司法范畴，以司法的中立性、终局性、公正性和强制性，裁判地方志违法行为，确保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公正司法是现代国家政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现代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

#### （四）着力培育全社会依法治志意识

有权威的法律才能被遵守；法律只有被遵



守，才能从字面上的法转化为行动中的法。毋庸讳言，虽然我国地方志文化传承不辍，源远流长，但是地方志并未形成普遍社会意识，尤其是没有形成家喻户晓的公众意识。仅就依法修志而言，也只是在一定范围内的共识，而依法治志作为新的意识形态，其全民意识培育无疑任重道远。我认为，在全民依法治志意识培养中，既要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强化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的主体责任，又要认识到依法治志是全社会的责任，只有将依法治志与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依

书馆，2014年，第1188页。

②刘延东：《在接见全国地方志系统先进模范代表时的讲话》，《中国地方志》2016年第1期。

③王利明：《中国为什么要建设法治国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④刘延东：《与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部分会议代表座谈时的讲话》，《中国地方志》2014年第5期。

⑤宣统《山东通志·序》，国家图书馆藏乙卯秋山东通志刊印局排印本，第1页。

⑥2015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全国地方志工作的重要批示，《中国地方志》2016年第1期。

⑦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第十二条，《中国地方志》2006年第5期。

⑧朱佳木：《深入学习贯彻〈地方志工作条例〉努力开创地方志工作新局面——在学习贯彻〈地方志工作条例〉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中国地方志》2011年第11期。

⑨《国务院法制办公室负责人就〈地方志工作条例〉的有关问题答记者问》，《中国地方志》2006年第6期。

⑩《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第1672页。

⑪《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第1708页。

⑫习近平：《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3年2月23日）。

法治志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依法治志与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紧密结合在一起，全社会的依法治志意识才能培育形成。

科学制定地方志法，是依法治志目标实现的前提；严格执行地方志法，是依法治志目标实现的关键；积极推动地方志活动司法化，是依法治志目标实现的保障；着力培育全社会依法治志意识，是依法治志目标实现的基础。

注释：

①《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商务印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

本文原载于《中国地方志》2016年第5期。《社科文摘》2016年第8期转载。）



# 勋悬日月 名勒春秋

## ——唐西平王李晟碑祠墓考

马琦 文/图

近年来，中华世界李氏西平忠武王宗亲联合会多次到高陵寻根祭祖，这些李氏后裔去的最多的两个地方，一个是位于现在高陵区修葺一新的昭慧塔院内的李晟碑亭，一个是210国道渭桥村东奉政原畔李晟墓地（墓址不详）。

### 一、李晟其人其事

李晟（727—793），字良器，洮州临潭（今属甘肃）人，唐朝宰相、军事家。原为边镇裨将，以战功累迁至光禄太常卿、泾原四镇北庭都知兵马使。代宗征调李晟入朝任左金吾卫将军、神策军兵马使。恰值羌蛮侵犯蜀地，朝廷令其统领大军支援，屡战屡胜，诛杀贼首。



乾隆间毕沅立李晟墓碑

建中二年（781），德宗

命李晟充任神策先锋都知兵马使、御史中丞，讨伐反叛的河朔三镇。建中四年（783）十月，泾原兵变，李晟前往奉天勤王，加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京兆尹、神策军京畿鄜坊节度观察使、商华等州兵马副元帅。

兴元元年（784）七月，李晟收复长安，平定朱泚之乱，迎德宗还朝。拜晟为司徒兼中书令，兼任凤翔尹凤翔陇右节度使、四镇北庭泾原等州行营副元帅，改封西平郡王，加食邑实封至一千五百户。德宗亲自撰写《西平王李晟东渭桥纪功碑》碑文，立于东渭桥，以表彰李晟勤王靖难之功。又命皇太子录下碑文副本，赐给李晟。贞元三年（787）三月，德宗在大明宫宣政殿召见李晟，拜授太尉、中书令，命他在尚书省治事。

贞元九年（793）八月四日，李晟去世，终年67岁，德宗“抚几哭于别次”，命百官到其府第吊唁，册赠太师，谥号忠武。李晟下葬时，德宗又亲到望春门送葬，派使者在灵车前宣读诏书，又命百官在路旁哭拜，“自都邑达关畿，无士庶，无老幼，皆发哀相吊”。同年十二月十六日葬于高陵县奉政原。

### 二、神道碑称三绝

李晟碑全名为“唐故太尉兼中书令西平郡

王赠太师李公神道碑”，唐大和三年（829）四月六日建，距李晟去世36年。此碑为关中唐代名碑，历代金石志书多有提及。碑文见于明都穆《金薤琳琅》卷14、清王昶《金石萃编》卷108、清董诰《钦定全唐文》卷538。碑名条目著录见于宋代赵明诚《金石录》、明吕柟《高陵县志》、明赵崡《石墨镌华》、明于奕正《天下金石志》、清毕沅《关中金石记》、清孙星衍《寰宇访碑录》、清王志沂《关中汉唐存碑跋》、清毛凤枝《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西安府志》、民国《陕西金石志》等。

李晟碑又名“三绝碑”，一说因碑文记述唐名将李晟生平及其功业，碑文为唐大学士裴度所撰，字为唐大书法家柳公权所书，且雕工精湛，皆有极高水平，为当时之绝，故世称碑为三绝碑。一说以事迹、撰文、书写三者称三绝碑。一说碑主为名将、撰写碑文的裴度为名相、书写碑文的柳公权为名书家，历代碑石有其一则可以名传千古，而李晟碑同时汇集了名将名相名书家，因此称“三绝碑”。

虽然人们对“三绝”的解释略有不同，但都入情入理自成一家，反而让这块在高陵奉正原渭桥村屹立1200余年的巨碑多了瑰丽的传奇色彩。1956年，李晟碑列入陕西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为保护此碑，县文管会于1994年将碑迁到文化馆保存。1998年，经陕西省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定为国家一级文物。1999年，省市文物局拨款对该碑进行保护，在县一中操场内新修碑亭一座，使碑石有了不受风雨侵蚀的栖身之所。2010年5月，高陵县与西安旅游集团战略合作共建统筹城乡发展示范区重点项目，昭慧塔综合旅游开发项目的重点工程昭慧文化广场开工建设。如今，李晟碑处于新修的塔院正殿西侧，周边环境得到了改善。

### 三、李昕奏请立碑

李晟薨逝到下葬之间相隔3个月，碑文记“自捐寝至安宅，皆所司办护”，属官办丧事。《唐会要》卷38记载：“贞元九年十二月。故太尉西平郡王太师晟，备礼葬于凤政原（应为奉政原）。是日，废朝，上御南望春宫临祭，令中使宣吊于柩车。文武常参官，皆素服送至长乐坡，哭拜于路。时太常卿裴郁草仪，设引令式书”。然而，李晟在下葬后并未立碑，按照唐葬礼的碑碣之制，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龟趺，上高不过九尺。李晟墓无碑长达36年之久，这在制度严明的唐代是极为反常的现象，也成为千古谜题。

太和元年秋七月，晟子李昕奏请朝廷为李晟立碑。李昕奏言提及“以公之徽烈，则御制碑文于渭川矣；以公之风度，则诏命图形于云台矣”。“御制碑文于渭川”，即指李晟在世时，德宗亲自撰文并立于东渭桥的《西平王李晟东渭桥纪功碑》。“诏命图形于云台”，即指贞元五年（789）九月，唐德宗命人将李晟的画像挂在凌烟阁上。文宗皇帝认为李昕兄弟奏请立碑是孝行，不可不从，且“宣我祖之丕业，繫尔父之嘉庸”，敕命裴度撰文、柳公权书丹并撰额。这才有了屹立千余年的李晟碑。

### 四、后世修祠祭墓

《宋史》卷105《礼志八》记载：宣和五年（1123），礼部言：“武成王庙从祀凡七十二将”。李晟为七十二将之一。这是目前所见到官方祭祀李晟的最早文字记载，但只是陪祀，并无专祠。

明代吕柟《高陵县志》“西平王李公祠”条载：“在迎翠门南十里，渭桥北百余步墓前，西向……弘治间王二十五世孙参政芜湖赞令知县璜建祠，赞撰有记文并诗”。李晟碑碑阴有《高陵县渭桥里祭西平王墓文》，记录了弘治十六年（1503）时任陕西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左参政李赞





九月二十一日祭扫李晟墓的梗概，高陵知县朱璜等县署官员、儒学生员同与行礼刻石。从碑文中可知，当时李晟墓地情形为“封茔之侧，颓丘荒凉，穹碑昭揭”。

李赞之弟，山西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李贡正德三（1508）年七月十七日祭扫李晟墓，高陵县署官员陪同并在李晟碑阴刻祭文。祭文中有“兄赞参陝，祠墓载新”，也说明李晟祠系李赞祭祀时所修。正德年间，高陵教谕李应奎向提学申请，春秋祭祀李晟。

晟二十九世孙李维标自楚游秦，到高陵祭拜李晟墓，撰有《祭始祖忠武王墓文》。祭文中有“置户守冢，禁樵百步”，即安置民户看护墓冢，墓地百步之内禁止砍伐树木。这在某种程度上为李晟墓设置了守墓人和保护范围。万历十四年（1586）中进士，其兄李维楨万历三年（1575）始任陕西右参议，后升提学副使。维标游陝祭墓年月未详，但从其祭文中“非婚非宦，观祖之光”推断，他当时还未入仕宦途，来陝祭墓当在1586年之前。

万历十六年（1588）李晟三十世孙、陕西左参议李蕴撰《重修忠武王墓碑记》，碑中记载：“墓在县之迎翠门南十里，旧有岁时祀王之祠，去渭桥之北百余步。盖二十五世孙赞所建者。赞参知关中政事，感梦谒王，恍如梦境，时命有司修茔建祠，遗墨至今存也”。此时距离李赞修茔建祠已经85年，高陵县令让儒学师生寻访墓地，“步绝麓，四顾徬徨，其山苍然，其墓离然，其祠为渭水之冲，披披然。”李蕴抚今追昔，落泪数行，“……捐供，属高陵君增封邱垆，易麦地，恢复旧址缭垣，式廊新卫，辟甬道而建神道坊，立石而题：西平忠武王之墓。移旧祠之庐，以葢其新构”。工程已过月余还未见起色，朝廷急调李蕴赴粤任职。后又历时不到两月，在高陵县令彭应参的经理协赞下，工程完

工。李蕴大喜，为之撰记，用以刻石。李蕴《重修忠武王碑记》、刻有“西平忠武王之墓”的碑石不知石湮何处。

天启三年（1623）八月二十七日，钦差巡按山西陝西河南等处监察御史、江西吉水晟公三十三世孙李日宣祭奠修祠，高陵存有祭文碑，仅剩上半截。董国柱先生编著的《高陵碑石》中有残碑拓片和录文，因碑石残断不全，无法通读。李日宣《敬修堂文集》中收录有祭文，可补碑石残断之文。与此同时，文集中还有《又重修祠墓记》，可谓珍贵异常。

日宣祭文提及“乃属县尹，治其松楸”，《又重修祠墓记》有：“先是王陵西南向，陵右故有祠，祠圯，惟裴晋公碑记在焉。陵之碑则置非其位，意是先宪副蕴草草一拜而树之，未辨其向也。而聂尹雅意，早且随所树碑向，筑墙以护之。又随晋公碑所在，架数楹以奠之。惜未合式耳！宣至，问往有墙乎？日久圯矣。问有祠乎？久毁矣。问有祀乎？曰祀典载春秋县官行奠。问何在？曰搭棚为奠耳。问其后人，惟守冢数灶，皆村农。每县官来奠，则顶香道傍，一迎而已”。

由以上记述可知，李日宣天启三年（1623）祭奠时，李蕴重修的李公祠已圯毁很长时间了。从万历十六年（1588）李蕴修祠到李日宣祭奠，仅相隔35年，足见当年李蕴建神道坊，新修祠庙工程虽然浩大，但保存时间并不长。这应是李蕴当年因为朝廷急调赴粤任职，修造时间紧迫，工程过于草率所致。李蕴未接调令之前一个月余，增高封土、恢复墙垣、修新祠、建神道坊、立石等，没有一项完成，但李蕴离开后不到两个月，所有工程完工，就连李蕴自己也惊叹“三月何速也”。

当时李日宣看到的墓地墙垣、数楹祭棚，均系天启二年（1622）出任高陵县令的聂溶修



建。但由于受到李蕴所立“西平忠武王之墓”石碑朝向的误导，所修墓地墙垣和祭棚的方位出与原本西南朝向的李晟墓出现偏差。

李日宣经过堪舆测量，获知墓地、墙垣、李公祠曾经的方位朝向，即西南向，渭水呈朝拜祠墓的走向。画定方位后重新改筑墙垣、李公祠。墙外栽荆棘树，墙内种植松柏。墙外空隙之地原属他姓的，议定价格后购买，用于建祠。祠虽狭小，但旧址不能改变，只得在里边拓展，开以广之。从寝殿门到外边牌坊的更设，则是县令聂溶董理建造的。

此前，春秋祭祀之时，高陵县令执爵，乡老民夫荷锄站立，年岁不好时，祭祀缺豚豆等祭品。李日宣认为这是不成体统、不合情理的。因此给陕西督学陈应元去公文，陈同意官方对李晟墓世袭奉祀，并给衣巾。县令买田供给祭祀，清理无人耕种的官地，安置人口耕种，缴纳赋税以供岁祀开支。县令聂溶在向李日宣汇报工程完工后并未提到相关费用，认为这是地方事务，不用提及。日宣说：祖孙之情，固然应该自己出钱整修祠墓，可以感念祖宗崇高的功绩，报答其恩德。修废举坠，虽自古以来是守令的职责，但日宣在祭祖修墓之际，不能亲自为祖宗置办一松一楸，那会是怎样一种心情呢。县官如能这样来考虑我的孝子之心，那就是合乎人情了。在一番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的说服之下，县令才将真实的工程花费报给日宣。日宣搜罗自己的一二积蓄，交付给县令偿还修墓建祠等工程费用。

高陵县目前保存的与李日宣修祠葺墓有关的碑石除了前文所述的残断祭文碑，还有一块残碑，碑文残存“唐太师西平”正书大字，上款为“天启三年癸（亥）”，下款为“三十三世孙”，笔力遒劲，字画端庄，结合祭文碑、重修祠墓记，可以推断此残碑为李日宣所立。

康熙二十三年（1684），李日宣族孙、翰

林院侍讲、陕西甲子科乡试主考官李振裕祭拜李晟祠墓，写有《告祖文》。文中以“忆昔孙宣，癸亥告虔。一纪初复，万祀綦绵”16字追忆了族祖父修缮李晟祠墓的旧事。“癸亥”即天启三年（1623），再次佐证了李日宣修祠祭墓的时间。祖孙祭墓之间，相隔60年整。又有“祠宇载葺，俾楔载新”，说明日宣和高陵县令聂溶修葺的祠、墓、坊等工程，虽然过了一个甲子，经历了朝代更迭，但基本保存完好。

以上史料和史实还可以佐证出光绪十年刊印白遇道纂修《高陵县续志》卷之二“西平王李公祠”条中“明万历间巡抚李日宣为王葺莹及庙”的表述是错误的，应为天启三年，而非万历年间。

康熙间，陕西提学使许孙荃捐俸修墓及庙，李因笃撰有《重修西平王莹庙记》。许担任陕西提学共三年，即康熙二十四年（1685）至二十六年（1687），其捐俸修西平王莹庙应在这三年间。

乾隆间，毕沅《陕甘资政录》记“乾隆乙未年（1775）修”。这是目前我所搜集整理的修葺西平王莹庙最后一次文字记录。乾隆乙未即乾隆四十年，时任陕西巡抚为毕沅，毕在陕西任职14年间，利用公务之余的闲暇时间遍访古迹，尽可能地给与保护和维修，并安定陵户、划分祭田，使这些早已无人祭祀的陵墓重新享受烟火，为全陕很多历史名人墓葬题名立碑。《关中胜迹图志》卷八记载“自莅任以后，每因公经过各府、州、县，凡有陵墓所在，必为下车，瞻拜谘访。……与省僚集议令各守土者即其丘陇莹兆，料量四至，先定封域，安立界石，并祝土墙。墙外各拓余地，守陵人照户给单，资其口食，春秋享祀，……庶古迹不就湮荒。”高陵文管所保存有一通石碑，额为“皇清”，双行隶书大字“唐司徒兼中书令西平忠武王李公晟墓”。此碑边款





处石料被凿，残破剥落严重，无法辨识。但对比毕沅在陕所撰文并树立的其他名人墓碑字体，此碑隶书苍劲，风格类同，应为乾隆间陕西巡抚毕沅所树。

### 五、“冢象祁连”探究

晟二十九世孙、明礼部郎中李维标《祭始祖忠武王墓文》有“冢象祁连，于彼高岗”，这八字是对李晟墓形状和所处地势的描述。“冢象祁连”与李晟之子李昕奏请为李晟立碑时对李晟墓描述是一致的，即“望有祁山之象”。

“冢象祁连”是有典故的，汉武帝时大将霍去病，十八岁即领兵作战，六征匈奴，大败匈奴于祁连山，功勋卓著。二十四岁病逝，汉武帝特许建冢象祁连山，以示殊恩，世以为荣。《汉书·卫青霍去病传》载：“（去病薨后）上悼之……为冢象祁连山”。

唐代对墓地封土形式有严格的等级规定，象山形墓并不多见，如昭陵陪葬墓中：司空、太子太傅、雄国公李勣（徐懋功）墓，起冢象铁山、阴山、乌德键山，封土高25米，直径98米。尚书仆射、卫国公李靖墓，起冢象明山、铁山、积石山，封土高12米，直径72米。象山形墓葬封土，是对有特殊功勋朝廷重臣的褒奖。时任检校司徒、义成军节度观察等使的李昕不可能不知道这种严明的墓葬规格和等级制度，他在给文宗奏请为其父李晟立碑的奏疏中直陈晟墓“望有祁山之象”。倘若李晟墓仅是普通的圆丘形封土，那李昕就有僭越之嫌。但从文宗赞扬李昕兄弟并下敕立碑的结果看，笔者认为李昕不是虚指，李晟墓应为象山形封土。

李晟为德宗年间奉天定难第一功臣，对李唐王室有再造之功。德宗亲撰的《西平王李晟东渭桥纪功碑》中有“东渭桥抵王城东北四十里，而国之廩积在焉。始晟於此驻孤军，纠群帅，俟时而动，一举成功”。唐东渭桥横跨渭水，北接

高阜奉正原，为京畿咽喉。这里是李晟驻军征战之地，铸就了他一生的功勋。德宗将其葬在东渭桥北的高陵奉政原，是对这位勋臣永久的纪念和最高的表彰。

### 六、民国旧影钩沉

因沉心于西平王碑祠墓资料的搜集整理，2014年1月28日，因公到北京出差，在国家图书馆查阅到一些高陵民国旧照片。其中有一张照片题为“高陵县西平王碑”（索引号6963-053、中图分类号J424.K928），这是我撰写此文时搜集的民国李晟碑唯一一张照片资料。

照片拍摄于民国17年（1928），13X11厘米，照片中李晟碑螭首圭额，镶嵌于砖砌碑楼中，碑楼额部正中有“天地正气”四字阳文砖雕。碑后远处隐约可见土筑围墙、村庄房舍、树木等。照片左下角远处和房舍树木相邻有一圆丘形封土，顶部高过房舍屋顶。此封土应为2000年《高陵县志》中记载的“王子坟”，位于县城南偏东8.15公里处奉正塬上，耿镇渭河公路桥北端榆楚乡渭桥村东侧，高约4.5米，周约60米，正南20米处有石狮一对，敲击时哨哨作响。因墓西侧300多米处立有唐故太尉兼中书令西平郡王赠太师李公神道碑一通，群众俗称为王子坟。1981年，省、县文物部门发掘所得之陶器、五铢钱币等殉葬品，经鉴定均系汉代器物。因此按省、县文物部门鉴定结果，定名为无名汉墓。

此照片摄者为邓之诚（1887—1960），字文如，号明斋，民国著名史学家，先后任教于北大、北师大、辅仁、燕大等学府，门下弟子成名者众多，在民国史学界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代表作有《中华二千年史》、《骨董琐记》、《清诗纪事初编》等，对于金石、藏书也有广泛涉猎。

（作者单位：西安建工集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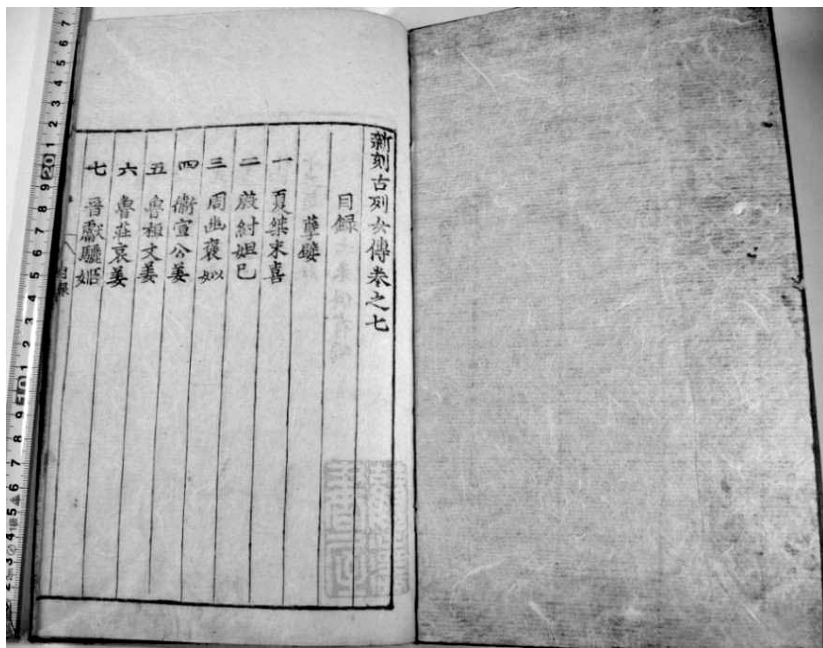
# 西汉名儒 ——刘向

刘向(约前77—前6),西汉宗室大臣,著名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本名更生,字子政。祖籍沛(今江苏沛县),世居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汉皇族楚元王刘交四世孙。

刘向初以父荫任辇郎,后擢任谏大夫。宣帝时选为儒俊才,曾应诏献赋颂数十篇。坐铸伪黄金下狱当死,赎出。治《春秋谷梁传》,讲论《五经》于石渠,复官散骑谏大夫给事中。元帝时,擢任散骑宗正给事中,与萧望之、周堪、金敞同心辅政。他用阴阳灾异推论时政得失,屡次上书言事,弹劾宦官弘恭、石显及外戚许、史,曾两度下狱,被免为庶人,闲居十余年。成帝即位后被启用,更名向,拜中郎,使领三辅都水,迁光禄大夫,官至中垒校尉。刘向多次上书,建议削弱外戚权力,甚为成帝嘉许,但终不能用。其为人平

易朴实,不重威仪,廉洁乐道,潜心学术,昼诵《书》《传》,夜观星象,常常通宵达旦。刘向喜言五行灾异之说,并据以论证现实政治。

其学问渊博,曾在长安未央宫石渠阁、天禄阁校阅群书,曾奉诏整理五经秘书、诸子诗赋



《列女传》





近20年，对古籍的整理保存做出了巨大贡献。撰成《别录》，为中国最早的目录学著作。

集合上古以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衍行事，以类相从，撰成《洪范五行传》11篇，为中国最早的灾异史。

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犹宠妾）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为我国最早的一部妇女史著作。《列女传》共分七卷，共记叙了105名妇女的故事。这七卷是：母仪传、贤明传、仁智传、贞顺传、节义传、辩通传和孽嬖传。西汉时期，外戚势力强大，宫廷动荡多有外戚影子。刘向认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即王教应当从皇帝周边的人开始教育，因此写成此书，以劝谏皇帝、嫔妃及外戚。《列女传》选取的故事体现了儒家对妇女的看法，其中有一些所赞扬的内容在如今的多数人看来是对妇女的不公平的待遇。《列女传》对后世影响很大。有一些故事流传至今，如“孟母三迁”的故事即出自该书。

撰成《说苑》《新序》《列女传》，其中有一些很有意义和文学特点的故事，是魏晋小说的先声。

另有《新序》《说苑》等，今存。《新序》原本三十卷，至北宋初仅存十卷。后经曾巩搜集整理，仍厘为十卷。内《杂事》五卷，《刺奢》一卷，《节士》一卷，《义勇》一卷，《善谋》二卷。采集舜、禹时代至汉代史事和传说，分类编纂，所记史事与《左传》《战国策》《史记》等颇有出入。《叶公好龙》就是出自此书。

《说苑》，又名《新苑》，古代汉族杂史小说集。成书于鸿泰四年（前17）。原20卷，784章。按各类记述春秋战国至汉代的遗闻轶事，每类之前列总说：事后加按语。其中以记述诸子言行为主，不少篇章中有关于治国安民、家国兴亡的哲理格言。主要体现了儒家的哲学思想、政治理想以及伦理观念。后仅存五卷，大部分已经散佚，后经宋曾巩搜辑，复为二十卷，每卷各有标目。二十卷的标目依次为：君道、臣术、建本、立节、贵德、复恩、政理、尊贤、正谏、敬慎、善说、奉使、权谋、至公、指武、谈丛、杂言、辨物、修文、反质。由于书中取材广泛，采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所以，给人们探讨历史提供了许多便利之处。书中记载的史事，有的可与现存典籍互相印证；有的记事与《史记》《左传》《国语》《战国策》《荀子》《韩非子》《管子》《晏子春秋》《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相出入，对考寻历史者足资参考。

文学上以辞赋和散文见长，《汉书·艺文志》载有其赋33篇，今多散佚，唯存《九叹》系拟屈原《九章》之作，在追念屈原之辞中寄托身世之感。其散文今存部分奏疏和点校古籍的叙录，著名的有《谏营昌陵疏》和《战国策叙录》，其文叙事简约，论理畅达，从容不迫，对唐宋古文家有一定影响。明人集有《刘子政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又有《五经通义》，已佚，清马国翰《王涵山房辑佚书》辑存一卷。



刘歆(?—23)，字子骏，后改名秀，字颖叔。西汉皇族宗室，刘向之子。祖籍沛（今江苏沛县），世居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

少时，以通《诗》《书》，能属文，拜黄门郎。河平年间，受诏与父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父死后继职中垒校尉。

哀帝初，经王莽举荐，官侍中太中大夫，迁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复领《五经》，得以卒父前业，撰成《七略》，为中国历史上首部目录学巨著。包括辑略(总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和方技略。辑略是写在六略之前的一篇概括性的学术简史。所以《七略》实际上分为六大类。《七略》对其后的图书分类学、目录学的发展影响深远。原书唐末佚失，东汉班固以《七略》为蓝本编成《汉书·艺文志》，从中可知《七略》的概貌。清代姚振宗等人有辑本。

自称校秘书时发现《周礼》《左传》《毛诗》《古文尚书》等古文经，并了解它们在民间的传授情况，建议为它们立学宫，遭到今文派儒者的反对，并由是忤执政大臣，乃出为郡守。

王莽持政，他因曾与莽同为黄门郎，颇受器重，历官右曹太中大夫、中垒校尉、羲和、京兆尹，直到封红休侯，成为王莽文化事业的中心人物；新朝建立，又拜为国师。在王莽的支持下，古文经不仅立于学宫，而且置立博士。后因怨莽杀其三子，又以南阳兵起，惧大祸将至，听从卫将军王涉言，将谋诛



莽，事泄自杀。

西汉末，在邓平《太初历》基础上，著有《三统历谱》，不仅系统阐述了八十一分法，而且初充了很多原来简略的天文知识和上古以来天文文献的考证，为《汉书·律历志》历法部分的蓝本。其具体内容有造历的理论，节气、朔望、月食及五星等的常数和运算推步方法及基本恒星的距离等。包含了现代天文年历的基本内容，因而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的雏形。造有圆柱形的标准量器。根据该器铭文计算，他用的圆周率是3.1547，世有“刘歆率”之称。

刘歆把董仲舒的“三统说”(即历史循环论，认为天之道周而复始，黑、白、赤三统循环往复)塞进太初历，稍加补充，改名《三统历》。由于汇通乐律、易数、五行等，以此解释历法中一些数据的来源，故而具有多元化视野。《三统历》是中国史籍记载的第一部完整历法。于西汉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开始实施，至东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为四分历取代。对后世历法产生了很大影响。

原有集，已佚，明人辑有《刘子骏集》。

刘歆是一个在学术上和政治上都名声很大的人物。学术上，章太炎说，孔子以后的最大人物是刘歆。顾颉刚称刘歆为“学术界的大伟人”。政治上，他是帮助王莽篡夺汉室江山，建立新朝的最主要人物之一。



## 清初著名将领——梁化凤

梁化凤是清初著名将领，清廷重臣。其人其事，古今书籍多有记载。

《西安市志》记载得比较概括：梁化凤（1621—1671）字翀天，又字岐山，号泮源。西安府长安（今陕西西安）人。清代将领。顺治三年（1646）以武进士入仕，初任山西大同阳和、高山卫守备、都司等军职，参加讨伐反清的大同守将姜瓖之战，冒死敢战，屡立战功，战后补江南芜永营参将，后迁浙江宁波副将。参加进攻张名振等反清武装，收复崇明岛平洋沙屿，十三年（1656）授苏松镇总兵。因崇明岛平洋沙屿守卫不便，梁督兵沿海筑坝十余里，使之与岸相接，并引水灌地，使海岸卤地成为良田。十六年（1659）郑成功率军攻崇明岛，梁率兵抗击，不久郑成功率大军攻破镇江，包围江南重镇江宁城（今江苏南京），梁率本部3000多人驰援，与江宁城清军共破郑军。清廷以功授梁世职，擢苏松提督，加太子太保、左都督，后迁任江南提督。在苏淞任内，梁“力修郡学，倡捐养士，屡赈饥民”，“士民感德，立生祠，并崇祀郡学名宦祠”。康熙八年（1669），梁化凤捐资将家乡泮河上的独木便桥建成48孔的“普济桥”，被百姓称为“梁家桥”，惠及当地百姓300余年。

梁化凤的故乡是今天的长安区小丰村。《西安村落记忆》“小丰村”记：清顺治年官授江南总督的梁化凤，为本村梁家堡（自然村）人。清廷封赐梁氏历代为清廷重臣。1999年梁氏后裔曾公布清廷“圣旨”20道。关于小丰村的村名，还有一段传说故事：相传，一次清康熙皇帝问及梁化凤家居何处？因避讳与皇家花园中的“大丰园”重名，遂改口喻对曰：长安小丰村。皇帝宣旨，封赐梁公化凤。后流传于故里，亦更村名为：小丰村。

关于其为家乡修桥一事：

清《长安县志》记：“《通志》载有梁家桥，在城南五十里<sup>[1]</sup>，跨丰水上，梁化凤建，雍正元年修。”民国《咸宁长安两县续志》记：“访得泮河有普济桥，系康熙四年故绅、江南提臣梁化凤所造。纯用石盘作底，石轴作柱，四面旋转，水不搏击而沙不停留，至今巩固。”

而前述《西安市志》记：“康熙八年（1669），梁化凤捐资将家乡泮河上的独木便桥



《泮河梁家桥碑记》

建成48孔的“普济桥”，被百姓称为“梁家桥”，惠及当地百姓300余年。”“小丰村”为《西安村落记忆》提供的资料也记为：“清康熙八年（1669），廷吏提督敏壮公梁化凤恩泽乡里，贷资修建原紧邻其北的普济桥。”

为什么修桥的时间前后相差4年？《西安府志》在前，所以记述的可信度更高。再者，如果修桥确系康熙八年，而其卒年为康熙十年，同样前者的可信度更高。

关于其卒因和墓地：

《西安府志》记：公以康熙十年七月二十三日薨，皇上震悼，辍朝。赠少保，谥“敏壮”。山西、江南两省祀名宦者数十区，陕西崇祀乡贤暨名臣祠。《清史稿》记：康熙十年，卒，赠少保，谥敏壮。圣祖巡西安，遣官祭其墓。说明或是病故，一些言其死于战场的传说显然站不住脚。

《西安府志》记：“梁化凤墓《关内周资录》：在鄂县北牛洞，御赐祭葬。鄂县。”《咸宁长安两县续志》记：“敕建化凤茔于鄂县之留犊村，故后世有寄鄂籍者。”实际上都指的是今户县牛东村。其故乡小丰村与户县接壤，所以说这一说法比较可信。

与其有关的地名：

在西安市，有一些地名与梁化凤有关，一是梁化凤在故乡所修的梁家桥；二是西安市内的梁家牌楼，东起盐店街，西接东夏家十字。梁化凤病逝时，康熙震悼辍朝，敕建坟墓于户县牛东村，并在陕西、浙江、安徽等地立功德牌坊。西安的梁家牌楼就位于梁家牌楼（街）上，有七八米高，上面书写着“梁家牌楼”四个大字，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时还存在；第三是西安梁府街（今青年路东段），当时是梁化凤的府邸，因而起名梁府街。

#### 附1：《西安府志》（校点本）卷第三十五

梁化凤 张英《梁敏壮功绩记略》：公，长安人，字翀天，丙戌科武进士。顺治四年，授山西高山卫守备。次年，以破姜瓖贼功，授大同掌印都司。

公气度恢廓，运筹制敌，取决寸心而发应如神。方授都司之明年，一岁中身经二十二战，所向皆捷。拔城拓地，斩将搴旗，而小寇剿杀不与焉。正月，攻破大同城，北窑沟败众窜据山巅，悬柴以火燔之，生擒敌将李义、张豹，而平其众。二月初十日，攻浑源州及韩村、玉合、张家三堡。二十九日，破贾庄城，擒敌帅王平。三月四日，破浑源州城，诛敌帅方三、唐虎。十三日，攻左卫之云岗、高山二城，降之。二十九日，围左卫，身先士卒，中三矢，督战益力。敌以城降，论功越六等，加都督佥事。五月七日，破敌将刘迁万余众于佳门、忻口。迁遁走太原，依敌巡抚姜建勋。十五日，公率兵攻之。次日，敌尽出其众，以致死战。公左臂中枪，右髀中箭，奋勇亟击，敌众披靡。执姜建勋并其监军，诛之。遂平太原。二十九日，引师解平阳城困。六月二日，至汾州，击敌帅沈海，败之。孝义县敌总兵张尔德来救，与战，大破之。明日，破汾州城，擒张尔德及敌平阳道张伟，驻兵北关。九月八日，沈海来袭我师，复败之，沈海遁之潞安。九月二十三日，攻曹家堡。





二十五日，攻记古塞、善信堡，皆下之。于是介休、平遥、祁县、徐沟望风悉降。十月四日，攻太谷县，苏升出战，殪其前锋。明日，城破，敌守苏升成擒。十月，引军下潞安，沈海复遁之九仙台。公至，克潞安，连拔马、苏、赵民<sup>①</sup>三寨。十一月四日，攻长子县，拔之。十一日，进攻九仙台，山势突兀，骑不得上，公以火攻之，众不能支，自诛其渠郭天佑、加友、罗真、崔海川、武二等。海势蹙，遂降。以胜兵进定泽州。盖公自五年冬从端亲王用兵至此，未尝一日解甲宁居也。次岁三月，复有牛鼻寨之战，生擒其将袁忠躬，杀其援将李虎。四月四日，尽歼其众，晋地悉平。

八年，以副将借补江南芜莱营参将，莅任之日，适石血、鹭鸶二湖大盗杨万科等作乱，公擒获之，并其党管有缙、杨天生等。十一月，授宁国副将。十二年秋，海寇张名振侵犯崇明，据泊平洋沙以窥县城。公统兵迎击于高桥、洪桥，获贼魁老寿、李七等二十二人，众贼溃散。次年冬，复师，以巨炮击碎贼舟，生擒许奇、潘忠等贼将，溺死无算，遂复平洋沙。十三年，授苏松总兵。因平洋沙悬隔海中，戍守不及，公就海筑坝，长十余里，使平洋沙接入内地，寇患乃息。且于其壩灌田千顷，厥后洪泽尽作膏腴，生民赖焉。

十六年五月，郑成功率众号百万，舳舻蔽海，先犯崇明，遣谍疑众。公斩使焚书，督兵迎击，擒贼将侯丁秀、官龙、陈义等。复遣诸将伏巷，邀截获贼犁，斩贼将陈正，缚致曾进等十一人，贼溃去。七月，成功统领大直抵金山，进逼瓜、仪，破镇江，围江宁。烽烟千里，南北中梗；援兵不利，声息危急。公闻，即提所部三千人，星夜抵江宁。登高审视，见贼中精锐尽屯江干。于七月二十三日统兵出仪凤门，身先巷战，拔贼巨纛，毁其木寨，命勇士乘高临下，屋瓦、利矢、飞火并发，轰如天降。贼将奔溃，自相践踏。追杀至龙江关，生获伪总统余自新，并擒伪总兵二人。贼之铁骑，杀溺殆尽；甲械、辎重，遗弃如山。贼前锋已败，而贼帅连营，尚屯满白土山冈，其众犹数十万。次朝，公命开神策门，亲统诸军，赴山奋击。另遣部将烧贼船只，绝其归路。贼惊扑战，我师奋勇争先，斩刈如拉枯朽。追奔逐北，血流有声，生擒伪提督甘辉。成功脱免，复逼崇明。公已先料，早遣二将回防，授以方略。及贼薄城下，二将登陴固守，而公乘胜进复瓜洲、镇江，复抵海口。贼不能得志，将为遁计，括民舟，出白茆港以渡。复与公遇，绝流奋击，炮石迷空，海波为沸，贼众尽散，成功仅以身免。

十六年八月，授三等阿达哈哈番世职。十七年，加太子太保、左都督。十八年十一月，授江南全省提督，授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世袭八次。嗣因海寇初平，游氛未息，朝议欲立界，迁沿海居民于界内。公谓以所弃地亩计之，当缺赋额若干。如以此益兵、添设营制，则国既足兵，民无废业。由是，江南沿海设兵以卫桑麻、鸡犬、耕凿、鱼盐，民到于今受其赐焉。

李因笃《梁敏壮名臣祠碑》略：公自盛壮登坛，老于战阵。干戈既靖，轻裘缓带，日与宾客饮酒赋诗。暇即临池，善草书、墨竹。又诸疏草、条议、禁令，并已刊行[世]。崇儒重士，月课观风，咸有成书。



长子鼎，御前侍卫。次鼐，苏松水师总兵、都督同知。按：《通志》：历官浙闽总督。次鼐，广东惠潮兵巡道、按察司佥事。次鼎，官荫候选。诸孙：长祚昌，仲祚晟，余幼。

公以康熙十年七月二十三日薨，皇上震悼，辍朝。赠少保，谥“敏壮”。山西、江南两省祀名宦者数十区，陕西崇祀乡贤暨名臣祠。

按：公以功世袭八次。次子鼐，因从征有功，议叙拖沙喇哈番，准袭一次。于康熙十六年承袭，遂并为二等阿思哈尼哈番，仍准袭八次。缘事革职。子祚昌，仍袭三等阿思哈尼哈番。祚昌故，子宏勋袭。年老休致，以孙秉暘袭。秉暘缘事革职，无嗣，乾隆四十二年以弟秉慎袭。

## 附2：《清史稿》列传三十

梁化凤，字翀天，陕西长安县人。顺治三年武进士。四年，授山西高山卫守备。五年，从英亲王阿济格讨叛将姜瓖，克阳和城，擒瓖将郭二用。擢大同掌印都司。时大同、左卫、浑源、太原、汾、泽群盗竞起应瓖。六年，化凤攻大同，破北窑沟，寇据山巅，悬柴以火燔之，获其渠李义、张豹。攻浑源，徇韩村、玉合堡、张家堡，破贾庄，获其渠王平；乃克浑源，又获其渠方三、唐虎诛之。攻左卫，降云冈、高山二堡，遂合围。化凤中三矢，战愈力，寇以城降。叙功，超加都督佥事，以副将推用。进攻太原，寇出战，化凤左臂中枪，矢集於髀，益奋斗，执所置巡抚姜建勋，乃克太原。进解平阳围，攻汾州，败其渠沈海。攻孝义，寇渠张尔德来援，与战大破之，乃克汾州，获尔德。海复以兵至，再战击败之，走潞安。迭下曹家堡、记古寨、善信堡。介休、平遥、祁、徐沟诸县悉降。进攻太谷，克之，获其渠苏升，乃克潞安，海走九仙台。拔长子，进攻九仙台，山峻，骑不得上；以火攻之，寇不支，海出降。进定泽州。是岁凡二十二战皆捷。七年，复歼余寇於牛鼻寨，获其渠袁忠。山西悉定。

八年，借补江南芜永营参将。讨平石皿、鹭鸶二湖盗，获其渠杨万科。十二年，擢浙江宁波副将。名将张名振屯崇明平洋沙，总督马国柱檄化凤署苏松总兵。名振攻高桥，化凤驰赴战，迭击败之，遂复平洋沙。十三年，真除苏松总兵。化凤以平洋沙悬隔海中，戍守不及。沿海筑坝十馀里使内属，并引水灌田，俾海滨斥卤化为膏腴。

会郑成功攻崇明，遣谍疑众，化凤擒斩之，督兵迎战，获其将侯丁秀、官龙、陈义等。又遣诸将设伏，斩其将陈正，缚致曾进等十一人。成功引去，七月，复大举入寇，连舟蔽江，号百万，陷镇江，直犯江宁，南北中梗。化凤将所部兵三千人疾驰赴援，升高了敌，见成功军不整，樵苏四出，军士浮后湖而嬉，乃率五百骑夜出神策门，破白土山敌垒。明日，督兵出仪凤门，提督管效忠出钟阜门，夹击搏战，拔巨纛，毁其木寨，简骁勇乘屋，发火器，矢石杂下，成功兵奔溃，逐至龙江关，获其将余自新等。成功收余众，连营屯白土山，众犹数十万。又明日，复与总管喀喀木等出神策门，直攻白土山，督将士





## 西安昆明池

2011年11月15日，在由西咸新区管委会主办，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管委会承办的“西安·昆明池文化生态景区规划方案评审会”上，16位国内知名的城市规划、考古、水利等多个领域的专家学者，积极为昆明池蓝图献策，为未来发展把脉，一致通过规划方案。按照规划，一个水面面积达4.5平方公里、接近杭州西湖、相当于10个曲江池遗址公园水系面积的昆明池，将呈现在世人面前。

西咸新区何以如此大动作、大手笔呢？这得从昆明池的历史说起。汉代的昆明池建于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位于长安城的西南，即今天西安市长安区斗门街镇周围十里。《汉书·武帝纪》载：“（元狩三年春）

发谪吏穿昆明池。”这说明了昆明湖的修建时间是公元前120年。

那么，为什么要修建昆明池呢？

汉武帝为了消除匈奴的长期侵扰，派张骞出使西域，准备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公元前122年，张骞从西域返回长安，向汉武帝报告在大夏国（今阿富汗）看到中国产的蜀布和箛竹杖，据说是从身毒国（今印度）贩运去的，估计西南夷可以通身毒国。对此信息，汉武帝非常重视，于是派使者探求通往身毒国的道路。然而，当大汉使者来到傍水而居的昆明族地区时，常常被杀死。《史记》载：“昆明之属——辄杀略汉使，终莫能通”。汉武帝因此大怒，决心以武力讨伐昆明。因昆明

---

仰击，寇迎拒，殊死战。甘辉者，成功骁将也，化凤入阵生获之。成功兵夺气，遂奔不可止，逐北斩馘。迫江上，化凤先遣别将焚其舟，成功兵自蹂藉及入江死者无算。成功遁入海，化凤策成功当还攻崇明，先遣别将为备。成功出海攻崇明，化凤自江宁还援；成功度不能克，括民舟将渡白茅口，化凤与相值，绝流迅击，砲石荡海波，成功复大败，跳而免。叙功，授世职三等阿达哈哈番，赐金甲、貂裘。

十七年，擢苏松提督，加太子太保、左都督。化凤疏言：“苏、松滨海，地袤八百餘里，标兵止二千餘。请酌调省兵三千八百，立六营，资捍御。”下部议，从之。十八年，上复录化凤功，进世职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寻裁江安庐凤提督，以化凤为江南提督。时议者以台湾未复，用广东、福建例，苏、松滨海立界，徙居民於内地。化凤曰：“沿海设兵，赋拟弃之地以养之。国既足兵，民无废业，迁界何为？”奏入，上从其言。康熙十年，卒，赠少保，谥敏壮。圣祖巡西安，遣官祭其墓。乾隆初，定封三等男。







昆明池效果图

有水，势必要学水战，于是便征发民工在长安西南开凿了一个周围四十里的人工湖，称之为“昆明池”。以象征洱海（一说是滇池）学习水战，准备以武力打通通往印度的道路。《资治通鉴》记载：“上将讨昆明，以昆明有滇池方三百里，乃作昆明池，以习水战。以故吏弄法，皆谪令代棘上林，穿昆明池。”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记载了当时的盛况：“乃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治楼船，高十馀丈，旗帜加其上，甚壮。”《长安县志》（嘉庆）记，在斗门镇北有残碑记有昆明池界址：北极沔镐村，南极石匣，东极柳坡，西极斗门。

2006年上半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第二工作队，对汉代昆明池遗址进行了钻探和试掘。考古研究所刘振东研究员认为，昆明池遗址范围东西约4.25公里，南北约5.69公里，沿岸一周约长17.6公里，方圆内约16.6平方公里。遗址范围内包括普渡、花园、南寨子、下店等28个村庄。遗址周边有南丰村、斗门镇等9个村镇。

当然，汉武帝的讨伐之役因故未能付诸行

动。但对后来者影响不小，清朝乾隆皇帝仰慕汉武帝的文治武功，把北京西湖更名为“昆明湖”，以志纪念。汉武帝用来演习征战的楼船，最终也没有派上用场，但却为后世留下了“汉习楼船”这一著名的历史典故。

昆明池延续了约950年，唐末五代之初，天灾人祸频发，烽火不息，昆明池逐渐干涸。昆明池在我国城市水利史上和文化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汉唐时期，昆明池在城市供水、京城建设、农业生产诸多方面起着巨大作用，最大水面面积曾经达到16.6平方公里，相当于三个杭州西湖。

昆明池遗址景区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一方面，昆明池、镐京遗址、周灵王台、普贤寺、牛郎织女等历史遗迹、文物古迹为昆明池遗址景区奠定了丰厚的文化底蕴。今斗门镇东南的石谷庙和北常家庄的石婆庙中的两尊石像，相传就是当年牵牛、织女的遗存。

西安西郊的昆明路，西安市长安区如今的昆明湖路，都是因为靠近历史上的昆明池而得名或起名，由此也可以看出昆明池对西安的深远影响。

重新规划和建设昆明池文化生态景区，有利于西安的环境建设，有利于促进西安的旅游业，更重要的是保护和挖掘了西安的一段历史文化，使西安这座城市更有文化底蕴。

2015年2月，昆明池试验段工程启动。根据方案设计，斗门水库库区总面积10.4平方公里，水库总库容4600万立方米，相当于4个西湖大小。预计水库工程总投资80.93亿元，2017年前将完成试验段工程，2020年全部建成。





## 西安大唐芙蓉园

2016年央视中秋晚会在央视一套和四套并机直播，全球华人通过电视和网络欣赏了这台晚会，芙蓉池畔，欢腾，隽永、恢宏。两个小时的直播，西安惊艳了全世界，大唐芙蓉园也走向了全世界。

让我们走进历史，寻访大唐芙蓉园的足迹。

大唐芙蓉园位于陕西省西安市曲江新区，建于原唐代芙蓉园遗址所在地。在唐代，芙蓉园就是长安城著名的风景区。位于都城东南隅，在曲江池之东。本名曲江园，隋时为离宫，文帝恶其名曲，以其有池盛植芙蓉，故改名芙蓉园。唐玄宗开元年间，增建了紫云楼、彩霞亭等建筑。园内青林重复，绿水弥漫，景色十分优美。宋之问《春日芙蓉园侍宴应制》诗：“芙蓉秦地沼，卢橘汉家园。谷转斜盘径，川回曲抱原。风来花自舞，春入鸟能言。”芙蓉园为皇家御园，亦名南苑，虽王公大臣非宣召不得入内。李绅《忆春日曲江宴后许至芙蓉园》诗中说：“春风上苑开桃李，诏许看花入御园。”开元二十年(732)，唐玄宗为随时来此游赏而不被外人所知，沿郭城东壁之外修筑了由兴庆宫南通芙蓉园的夹城。夹城南端的城门，名新开门，在今西安城东南郊曲江新区新开门村。

芙蓉园中的紫云楼，初建于唐开元年间，“安史之乱”中毁于兵火。大和年间，文宗为恢复曲江芙蓉园风景而重建。每至曲江大会，皇帝则登此紫云楼垂帘观看。这里需要交代一下曲江大会。曲江大会是唐代长安的一种风俗，即每年新科进士齐集曲江进行宴庆。因其在关试之后举行，故又称关宴。又因其设于曲江池西杏园之中，又称杏园宴。还因宴后进士分奔前程，各有所去，又称离宴。此俗起于中宗神龙年间，主要内容有两项：一是游玩筵会，二是吟诗讴歌。唐人重进士，每科最多只取30人，中唐以后高级官吏，进士出身居多，故登第者无不极感荣耀，所传此会诗歌之作，多表得意之情。《唐摭言》载：“其日，公卿家倾城纵观于此，有若中东床之选者，十八九钿车珠鞍，栉比而至。”这一风俗，一直延续到唐末僖宗乾符年间。宋以后演变为在汧梁琼林苑由皇帝赐宴新科进士的琼林宴。

芙蓉园中有彩霞亭，初建于唐开元年间，安史之乱中毁于兵火，再建于文宗大和时期。

随着唐朝的灭亡和中国经济政治和经济中心东移，曾经辉煌的芙蓉园也被历史和时间所湮没，以至于后来成为村落，因为许多村庄的名字还留有当年的印迹，如曲江、新开门等。

21世纪初，西安开始实施“皇城复兴计划”，皇城复兴计划包括古城墙、顺城巷城市设计、骡马市步行商业街、大唐西市、长安锦园坊、大唐芙蓉园、唐大明宫御道规划设计、西

大街改造、都城隍庙规划设计、洒金桥规划设计、贞观广场规划设计以及“西部第一水城”的规划设计等。

大唐芙蓉园位于西安市曲江新区，占地1000亩，其中水面300亩，总投资13亿元，是西北地区最大的文化主题公园，建于原唐代芙蓉园遗址以北，是中国第一个全方位展示盛唐风貌的大型皇家园林式文化主题公园。包括紫云楼、仕女馆、御宴宫、芳林苑、凤鸣九天剧院、杏园、陆羽茶社、唐市、曲江流饮等众多景点。大唐芙蓉园创下多项纪录，有全球最大的水景表演，是首个“五感”（即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味觉）主题公园；拥有全球最大户外香化工程；是全国最大的仿唐皇家建筑群，集中国园林及建筑艺术之大成。园区仿唐建筑设计建设、园区景观设计建设，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典建筑、古典园林建设。大唐芙蓉园以它独特的魅力和无可比拟的历史地位，成为华夏子孙寻根追梦的文化祖庭和重温盛世的精神家园，被誉为“中华历史之园、精神之园、自然之园、人文之园、艺术之园”。

2005年4月，大唐芙蓉园开园。2011年1月17日，国家旅游局授予西安大雁塔——大唐芙蓉园景区国家5A级景区荣誉。

字词文化趣谈之典故史籍

### 司马昭之心

大家常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意为野心非常明显，为人所共知。

司马昭是三国时魏国人，其父司马懿是魏国的大将。魏明帝曹睿死时，托付曹爽与司马懿辅佐齐王曹芳治理天下。曹爽与司马懿互相排挤，经过激烈的权力争斗，司马懿尽诛曹爽一党，魏国军政大权落入司马氏手中。

司马懿死后，大儿子司马师不久废除了已经成年但迟迟未能亲政的曹芳，另立十三岁的曹髦为帝，权势比司马懿更大，但没有多久，就病死了。司马师在病重的时候，便把一切权力交给了弟弟司马昭。

司马昭总揽大权后，野心更大，总想取代曹髦。他不断铲除异己，打击政敌。年轻的曹髦知道自己即便做“傀儡”皇帝也休想当长，迟早会被司马昭除掉，就打算铤而走险，用突然袭击的办法，干掉司马昭。

一天，曹髦把跟随自己的心腹大臣找来，对他们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我不能白白忍受被推翻的耻辱，我要你们同我一道去讨伐他。”几位大臣知道这样做等于是飞蛾投火，都劝他暂时忍耐。在场的一个叫王经的对曹髦说：“当今大权落在司马昭手里，满朝文武都是他的人；君王您力量薄弱，莽撞行动，后果不堪设想，应该慎重考虑。”

曹髦不听劝告，亲自率领左右仆从、侍卫数百人去袭击司马昭。谁知大臣中早有人把这消息报告了司马昭。司马昭立即派兵阻截，杀掉曹髦。

后来，人们用“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来说明阴谋家的野心非常明显，已人所共知。





## 西安人的婚宴



胡军辉

西安人把聚众就餐叫“坐席”，主家负责备席，是不能说“坐席”的，“坐席”的都是主家请来的亲朋好友。大凡婚、丧、嫁、娶、红、白喜事，都要请人“坐席”。婚宴这样的席面，最隆重热烈，最具喜庆色彩，最引人注目，因而花费也是最大的。置席位请人“坐”，既显出客人的尊贵，又显出主人的气派，来的人越多，说明主家人缘越好，气派越大，是很有面子的。

20世纪90年代以前，城郊人请人“坐席”，帮忙做饭炒菜的都是同村人，叫“执事”。主家事先请来执事，估摸来客多少，计划做多少桌饭菜。把原材料采购回来后，就在自家院子里搭棚、盘锅灶操办。进入21世纪后，有了专业“执事”队，主家只需和执事队老板谈好全包还是半包就是了。执事在主家院子搭棚子，置炉灶，还带来碗筷、碟子、桌椅等用具，算在费用里。专业执事依然做传统“席面”，吃两顿饭，早饭吃臊子面，午饭吃炒菜。

浐河以东，灞河以北我老家灞桥镇地区的人，给臊子里加粉面，臊子汤就黏黏的，切得细小的肉丁、豆腐块、木耳、黄花、海带、冬瓜、韭菜等臊料子，均匀地参浮在臊子汤的

各个层面，不会沉淀碗底，放一筷头面，浇上臊子汤，便是一碗臊子面，再调上油泼辣子，酱油醋，吃起来润滑筋道，吸溜吸溜的，三口两口吃完了还不够，就再来一碗。加粉面是一种风味，还有保护面条的作用。面条薄而细，若放在清汤利水里，及时吃还好，放久了，面条就会泡软，少了嚼头，有粉面保护，放久了也一样筋道好吃。粉面臊子面实在是灞桥人做席的一大智慧。午饭通常炒八个凉菜，八个热菜，外加一大盆丸子汤，“丸”音同“完”，等丸子汤上来了，菜就上齐了。

农村人多，又没有那么多桌子，就吃流水席。上一拨人吃完了，把桌面清理干净后，下一拨人接着吃。

乡党们不用忙活做饭，却跑前跑后帮主家招呼来客。每有客人来，就有人招呼：“里头坐，上臊子面。”来客坐在饭桌旁，执事把臊子面放到跟前，自己根据口味，调上油泼辣子，酱油醋，就“吸溜吸溜”地吃，院子里满是鲜香的韭菜味。

如今坐席不兴送东西了，城里乡里，来客都送红包。主家门口放一桌子，有专人负责登记。按关系远近，个人经济状况，少则一二百，多则三五百，也有送一千两千的。无



论多与少，收人家多少礼金，到人家办喜事时又返回了。

城里人大多只有一个孩子，无论嫁女还是娶媳妇，婆家娘家同样重视，“彩礼”就说说而已，并不真当回事，还争着办婚宴。只是婆家支出少了，怕人家说儿子倒插门，理不直，气不壮，就宁愿多花些，因而婚宴通常都由婆家主办。

后来把“坐席”改口说成喝喜酒，大约是“吃”在生活中不那么重要了。虽说喜事不请不来，时常也会听到关系近的，或者想拉近关系的人这样问主家：“啥时候给娃办喜事呢？等着喝喜酒呢。”主家就喜滋滋地说：“快了，到时候叫你。”

婚宴在饭店里办，饭店得提前好几个月预定，传统习俗中的好日子都排得满满的。饭店里没有臊子面这顿饭，能吃臊子面的是很少一部分早去主家帮忙的人。这个普通人操办的属于自己的盛典，来客都是自己请来的亲朋好友，没有职场的勾心斗角，没有官场的阿谀奉承，没有商场的尔虞我诈，人与人之间洋溢着难得的平等与喜气，我十分乐意参加。

人到中年，像一年到了秋天，果子一个一个地摘，婚宴一个一个地参加。

虽是喜酒，也看和谁喝呢。若是不熟悉的人坐一桌，就不容易喝起来。有经验的主家会考虑得很周到，让熟悉的人坐一起，起码相距不远。我参加过很多婚宴，安排的都很好。最开心的是和老同学坐在一起，尤其是从小到大的同学，不用推让，也不会担心谁诚心灌醉谁。一开始，大家都很谦虚，文文气气地抿一口，等酒精发挥作用后，脸上泛出了红晕，话就多了，说不能喝的人也不拒绝了，倒上了就

喝，还频频起身给别人敬酒。喝多的人免不了胡言乱语，把别人的老婆当成自己的老婆。那女人就摇摇曳曳做“千娇百媚”状，轻轻坐到他大腿上，嗲声嗲气叫一声“老公——”，接着狠狠地在他脸上掐一把，撩一句陕西话：“想的美！”，起身走了。

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西安市对各级领导干部婚丧嫁娶立了“限桌令”，当领导的不敢那么铺排，规模就小一些，请谁不请谁却成了难题。一个处级干部给孩子办婚事，小范围通知了一些人，没通知到的知道了，也想去，就问具体的时间地点，知情人只好说喜事不请不来。那人十分郁闷，自言自语道：“唉，平常看不出来，这会儿才知道人家和谁近了。”

无官一身轻的人自己花自己的钱，就没那么多顾虑，大事没干成，就弄他一个大场面，把方方面面都请到了，通常都是四五十桌，场面热烈而隆重。婚宴是给下一代办的，更是父母人生态度的展现，还可能是其一生中最高傲，最出风头的事。从筹办到举行，要经过很长时间的酝酿，生怕哪个环节出了差错。他们就守着一个宝贝儿子，从小宠着爱着，搂着抱着，一把屎一把尿地养大，忧愁着他的忧愁，自豪着他的自豪，生气了骂几句，即便他摔门而去也不阻拦，知道他还会回家来。这时候，他要独立于父母成立一个新家，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了。母亲意识到，与儿子那根天然相连的脐带要彻底剪断了。有了媳妇，父亲也不能像曾经的那样，想说啥就说啥，想发脾气就发脾气，而这个节点便是以婚宴的形式表现的。父母的心理十分的矛盾，既盼着婚宴到来，又害怕婚宴到来，因为就办这么一次，到来意味



## 雁塔棉絮画



雁塔棉絮画传承人张宝兰

棉絮画是以棉絮为主要原材料来制作图画的，其以优质棉花为原料，对其进行高温、药物处理，进行染色，得到着色棉花。

作画时，先将画绘于画纸上，勾出清晰的部件轮廓，分解为大小部件，用着色棉花部件进行底色层粘贴和覆着色层粘贴，将部件粘贴于背景布上。

用棉絮所作的图画色彩丰富，形态生动逼真、栩栩如生，特别适用于花卉、翎毛类图画的制作。作画所用各种颜色的棉絮，是用上等长纤维棉絮，经活性染料染色后，风干、分层制成的。棉絮作画所用的原材料，便宜易得，作出的画具有色彩丰富，立体效果好，形态生动逼真等特点。

“雁塔棉絮画”最早流传于陕西西府一带，随着传承人张宝兰入户雁塔区，将其制作工艺带入雁塔地域。“雁塔棉絮画”的色彩鲜明，形态逼真，制作工艺独特。该工艺不仅能表现出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动物和花鸟，且如国画一般还能表现出复杂的人物、山水风景。棉絮画最具有的魅力是弥补了笔墨达不到的立体浮雕般的艺术效果。近年来，在国内外文化交流中被誉为：“东方的立体画”。作品被前美国总统克林顿先生、德国、比利时、新加坡、加拿大等国收藏。

着结束。

但他们依然是欣喜的。有的人从来没有站在主席台、手持麦克风对公众讲话，早已习惯了坐在台下听领导讲话。这时候可以身着盛装，过一把“领导瘾”，可以面对广大“群众”，拿腔拿调说几句话而不怕谁笑话。有的父母打扮得像主持人一样，一同站在台上，用朗诵的语调你一句我一句，向来宾祝福致意，

引得满堂喝彩。更多出现在婚宴上的父母们，被好事者画成五花脸，眼睛笑成了一条缝。

曲终人散之时，目送完远去的客人，回望杯盘狼藉的宴会大厅，父母们常常会显出落寞神情，内心像掏空了一般，有的人甚至潸然泪下。他们不是心疼这笔花销，而是在慨叹，孩子大了，我们也快老了。

（作者单位：西安市卫生局）

## 周至殿镇八卦锣鼓

周至殿镇八卦锣鼓由道教中的“八卦阵”演变而来，深受道文化影响，有深厚的积淀和底蕴，保留着土生土长，原汁原味原生态。其鼓谱“长经鼓”、“十样景”在关中地区独具一格。鼓舞鼓阵阵容庞大，远近闻名，曾多次荣获省市县锣鼓大赛表演大奖。

殿镇八卦锣鼓分为五章节。第一节为“前奏锣鼓”，激烈、高昂、欢快、英武。第二节为“八卦阵鼓”，按八卦方位定员，依八卦动静结合，8鼓手相互穿插飞跃，随鼓位旋转打击，鼓锤上下翻飞，里外飞越，象征着人间万物生生不息，永不中断。第三节为“仙女散花”，8—16名女桶鼓手腾挪旋转，手舞足蹈，翩翩起舞，裙带飞扬，空飞散花。象征着众仙女拨云布雨，歌舞升平，把美好的祝愿洒向人间。第四节为“天下太平”，第五节为“喜庆锣鼓”，9种配器汇集打击，突如闪电瞬间汇集，表现了高潮迭起、热烈、强劲、欢快的喜庆气氛。殿镇锣鼓的乐器有：大鼓、中阵鼓、小鼓、桶子鼓、手鼓、大钹、小钹、大锣、小锣等。服装道具有龙凤旗、唐鼓服、花伞、红绦条、彩车图布等。其代表性节目有《腾飞锣鼓》《殿镇老鼓》《八卦阵鼓》等，深受老百姓喜爱。2011年，《周至殿镇八卦锣鼓》被分别列入陕西省、西安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张天顺、王稳存被命名为西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 长延堡村

长延堡村东邻长安南路、陕西师范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北连西北政法大学、杨家村军干所，西接朱雀大街、明德门小区。南邻丈八东路、西安市第八医院，陕西电视塔、农林巷等。北有唐明德门遗址，东有唐天坛遗址。东边是瓦胡同村，南邻西三爻，西近潘家庄、沙滹沱，北接杨家村。

1949年西安解放时，堡子内有门楼37座，约80户，店门16户。共有96户，380余人，土地约1000余亩，其中包括禄继芳在曲江池一带的100亩左右的土地。2012年，有503户，1470余人。村内有主要有孙、余、韩、禄等几个大姓，还有张、王、傅、杨、李等其他姓氏。

长延堡村俗名称作“吴家坟”。行政上称作“长延堡”，既是一个村落概念，也是一个地区概念。据说“吴家坟”得名要早于“长延堡”。之所以将村叫做“吴家坟”，是因为早期在村前的长安路边，有吴家的一座坟，坟建立于何时，已经难以考证。据本村老书记吴家治回忆，在新中国成立前，每年都有到这儿祭祖的吴家的后人。那时没有车，都是徒步而来，有老者，也有年轻人。每次都来十几个至20人左右。往往都是天不亮就出发，到这儿已经是上午10时左右了。在祭拜完毕后，还要在大庙里休息一阵子。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年里，记得还有一位留着长胡子的老者，带着一帮后生到这儿祭祖。此坟的主人叫做吴光照，其后人在咸阳北塬



叫做吴家堡的村庄居住。

吴家坟处在从西安南门到长安韦曲的长安路的中段。长安路作为西安南郊的主干线，从过去到现在人流一直很多。特别是过去，没有汽车，路人都肩挑手提，徒步而行。那些赶马车的，推小车的，挑担子的行人，往北或者向南，到吴家坟时总得缓口气，所以这儿就成了理想的休息场所。在马路两边居住的村民，看到这一商机，就在门前开店立铺，做起生意，于是就自然形成了一条日益繁荣的商业街。

那些过路之人在路上或者回到家里，每当别人问起在哪儿歇脚时，便顺口回答是在“吴家坟”。久而久之，“吴家坟”的名称就被称呼起来，而守墓人及其房屋随着时间的发展消失，这一名称延续下来。

后来据说村里的文人嫌这名字俗气，就



以“长延”来命名。意为“长命百岁，延年益寿”，寄希望于后人。当时凡有围墙的村庄大多称之为“堡”，故而叫做“长延堡”。

因村子离城刚好10里，所以曾以“南十里铺”称之。只是后来没有被广泛传开，也就鲜为人知。

从西安的行政区划来说，东有灞桥，西有三桥；北有张家堡，南有长延堡，组成了西安东南西北四郊的四个铺驿。清嘉庆《咸宁县志》称“长延堡”。《咸宁长安两县续志》中有“长延堡俗名吴家坟”的记载。

据考证，长延堡村最早建于明朝洪武年间，当时朱元璋制定咸宁长安“高筑墙，广积粮，缓称霸”的战略方针，以后在民间广泛流传“汉塚唐塔朱打垣”的民谚，从皇城到地方，乃至村镇，无不以城墙作为防御的堡垒，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军事防御体系及战略思维。明朝初期各地到处修筑城墙，西安的城墙也是那时候修建的，长延堡的围墙，从那个年代开始修建。

据说，在清顺治十一年（1654），左卫武举人孙焯，担任京都安定门千总。出任山东钦差，加授宣威将军（从一品武官）。曾帮助长延堡对当时的围墙进行加固和整修。

新中国成立前曾有过“六区杏原里吴家坟甲”之称，实行“保甲制”。新中国成立后于瓦胡同村的宋家花园建立第一个乡政府。后来在土改时，又在长延堡村东南长安路边划出3—4亩土地，作为乡政府的所在地，取名“长延堡乡”。

1951年实行土地改革，查地定产，核实土地，分田到户。1953年成立两个互助组。从1954年的初级社，到1955年的高级社，再到1956年的人民公社，被称为“三年三个社”。1956年成立党支部。

1960年下半年与杨家村合并成一个生产大队，称“红旗”大队，隶属东方红公社。固定资

产不动，只做人事上的变动。当时有“金星银星加五星”之说。金星由瓦胡同、庙坡头村组成，银星由南窑、三爻村组成。1961年11月，公社恢复以各自然村为单位的村级组织，仍称作生产大队，村民被称作“社员”。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村内分为两派，在中央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下，社员一边投身于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之中，一边参加生产劳动，保证最低的生活来源。后期军宣队进驻

村内，一面帮助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组成权力机构，一面进行生产劳动。

1983年到1984年，在村西划拨40余户新庄基，由村里统一规划，村民自建，60米为一排，每排连路宽20米，总共盖了7排两层小楼。1986年至1987年，又在村西为村民划分庄基地。村民居住面积迅速扩展，外来做生意和上学的人员不断涌现，村民不失时机地扩建房屋，广招房客，增加经济收入。村内各主要街道已成自由贸易市场，经济开始繁荣，商贸逐步呈现兴旺之势。

1995年，新班子开始整修村内破损路面，解决村西饮水问题，开通全村闭路电视，在轩家巷口修建新村大门。1996年春节过后，组织全体村民到武汉、重庆等地旅游。宣传动员村民集资入股，将原村木工厂、印刷厂拆迁，扩建长延堡农贸市场，兴建长延堡商城。1997年在村西共建7座楼位，拉开了建设都市化住宅小区的序幕。1999年春节之后，初步规划首批拆迁范围，从村西开始拉开了拆迁的序幕，在村民中实行自愿拆迁申请，拆迁在村内四处开花，拆迁安置开始实施。并开始建立长延堡杏园小区。至2000年建成46栋楼房，建筑面积22万余平方米。市政修建的天坛西路穿越小区而过，将小区分为南北两院。在原村西的旧址上建立的唐皇高港A、B两座楼位，坐落在长安南路的西边，华东商贸服装公司在A座的长安路边建立华东服饰广场，与长延堡





## 东三爻堡村

位于长安南路南段，凤栖原北麓。隐钟灵毓秀之地，原为坡塬之庄。据考建于明朝（1403年左右）。皇天厚土，南高北低，北对杏园岭，南依凤栖塬，东西有沟道，村呈“龟寿”型，村内“四合院”建筑考究，屋脊钩心斗角，欲比高低，街巷相连，地道相通，树隐房屋，古槐抚檐。四周“城墙”酸柳挂翠，花木环绕。村北池塘碧波荡漾，鸭鹅戏水。啼鸟声声处处，秀木叶丛丛，和风来，静谧无限。具有关中标准式的古堡建筑风格。立于村南，极目环视，东眺汉帝遗陵，曲江流饮，壑坡起伏，白鹿驰塬，鲸鱼出沟；南瞻秦岭碧障，翠花神女，太白积雪，群峰巍峨，终南观止；西顾清凉古寺，宝杉参天，佛号经声，泮惠潺潺，千里桑田；北俯长安古都，唐韵汉风，宫阙楼阁，城河环抱，名胜古迹尽收眼底。

按居住先后，以麻、白、杨姓为序，依人口多少以杨、麻、白姓为主。始祖就此安身立命，耕土为田，凿地为井，挖窖为屋，台榭为房。播五谷以足食，筑牖户以安居。勤劳耕作，繁衍生息。岁月更迭，村强人旺。村北门楼有人赠“杏园春晓”美称，东门有韦杜同声咏赞之石刻。

东三爻堡村来由：“三爻”乃易经中的卦象，三爻为人位，则东三爻为上三卦，且方位，寓意紫气东来，吉祥太平。而“堡”为地形的高低之别，有“城堡”之意。

中华民国时期，村人主要以耕作置地为发家资本，以倒贩、加工稻谷为发展途径。城乡沟通，农商结合，逐步发展到骡马成群，车辆为帮；良田百顷，村民千人。乡土浓厚，民风淳朴，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忠厚待相邻，团结护村庄。逢喜玩“社火”，遇旱伐“马角”。

购物中心形成商业区域。

新中国成立初期，分为堡子和店门两个部分。堡子围墙之内的村民，东边有唯一的一个大门。店门在长安南路两侧，已经形成了一个商业街市。合作化期间，对小生意及摊贩做了限制，于是店门不再有商业气息，变成单一的以从事农业劳动为主要生存方式的村民。20世纪80年代左右，由于钢筋混凝土的广泛使用，村民的房屋开始由土木结构的瓦房逐渐向砖混结构的楼房过渡，村里的面貌也在发生变化。村子迅速扩大，

居住的房屋，行走的道路也都变成水泥建筑。在广大村民都住上楼房的今天，家里有限的居住面积，难以招待亲友的来访。加上如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居住环境的改善，逢年过节的设宴待客也在发生变化。在附近饭店举办节日宴会，既时尚又方便，使主人家少了几分劳累，多了几分轻松。随着村民居住环境的改善，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对健康生活更加向往。村民都开始重视锻炼。自从小区在南北两院安装了健身器材之后，便成了村民锻炼活动的重要场合之一。





在私有制的社会条件下，因医疗卫生落后，成活率下降，人口增长不显。土地分配不均，大部分被少数人占有，生产力底下，穷富相差，两极相生。阶层悬殊，矛盾升华，阶级斗争激化。

新中国成立，公有制取代私有制，集体经营取代个体经营，土地实行集约化，耕畜、大型农具归集体，生产关系发生彻底改变，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成立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

主义”的总路线指引下，步入“队为基础，等价交换，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进入社会主义“大家庭”。

东三爻堡照例经受了“三反、五反、社教、文革”的社会主义政治运动，其经济发展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影响或促进。人与人充满了“阶级斗争”意识，不管是“上层建筑，思想领域”，还是意识形态，政治运动洗礼了社员们的头脑，只好高喊着“抓革命，促生产”，实际上是用“瓜带菜”及农副产品的秸秆充饥。人们只懂得“人要吃饭，地要打粮”。老村地形复杂，四周坡塬起伏，长期靠天吃饭，人们形象地说“拐拐路，坡坡田，吃水更比吃油难，好女不嫁三爻塬”。

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在“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方针指引下，高举“农业学大寨”旗帜，牢牢掌握“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原则下，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开始。憨厚、敢干的东三爻堡人，在战天斗地，人定胜天的精神支配下采取人海战术，集结全体劳力，投入到农田基本建设中。十几年的大会战，战严寒，抗酷暑，全靠人挖车推，移坡填沟，挖大口井，造梯田，平整土地，不知搬了多少坡，填了多少沟，涌现出多少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最后挖大口井12眼，造水田近千亩，粮食稳产。分配仍然还是“先国家的公粮，再集体的储备粮，后个人的口粮，社员仍是躬身背苍天，终日汗夹衣，低头对黄土，待时粮充腹”。

当时全村1100人，不到300户，小麦平均每亩产300斤，单价0.138元/斤，玉米平均每亩400斤，单价0.096元/斤。据当时成本核算，每斤粮食需要投资0.225元的费用，一个生产队全年总收入不过7万—8万元，年终参加分配的只有1万—2万元，好一点的队40%是“空账”分配，一个工日只有几毛钱，全年人均不到100元，“超支户”逐年增加。村办的砖厂、木工厂、缝纫厂，产值寥寥无几。社员只有在房前屋后养鸡养猪交到“公家”换几个零钱，攒的粪多挣几个“工分”。生产队是社员的依靠，口粮是社员的命根，工分是社员唯一的收入。社员争着挣大工分，抢着出外挣补贴。不上工既不能记工分，又不能发口粮。社员纵有改天换地之力，也难摆脱贫困之境。

改革开放，彻底摆脱了集体作业的禁锢，完全解放了生产力。20世纪80年代初，人民公社解体，砸烂大锅饭，废除了“一平二调”，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承





包到人”，村民拿到了30年不变的土地承包证，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村民人尽其才，物尽其力。独立经营像雨后春笋，种粮、种菜能手施展自己特长；运输业发挥地方优势，全村发展30多辆马车；私人企业有木工厂、印刷厂；手工业有电气焊、修理部，饮食业有小食堂、面包房；养殖业有猪场、鸭场、奶牛场；砖厂、木工厂、楼板厂等村办企业遍地开花。村民的生活水平相应提高，基本解决温饱问题。

20世纪90年代，改革进展，政策透明，村组意识到城郊结合部的农业不是发展致富的根本途径，只有租地、征地才能提高土地的升值率。于是，先后租地、征地：长延堡私营工业园区200余亩；三宝双喜集团公司70余亩；光华通讯有限公司、喜加喜酒厂、外事学院、公安商城、水泥厂、海绵厂、橡胶厂，星罗棋布。带动了本村的经济的发展，提高了村民的生活水平。

其间，80%的村民已经迁入新村，主要以两层楼农家小院为主，房客分布不均，房产收入不等，关键是周边及长安路没有发展起来，另外村内街道设施没有硬化。村民仍以分散独立性的多种经营为主。土方机械工程有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机械十几台；运输业利用了本地的地理优势，由原来的马车进化到拖拉机、汽车运输，出租车也逐步兴起；剩余劳动力外出打工，拉活的、做小生意、种植业、养殖业及私人企业蓬勃发展。

2000年初，村委会制定“加强村内整治，大力对外开放”的方案，全力改造村容村貌，建设硬件设施，改变投资环境，招商引资。完成拆旧搬迁，500多户村民全部迁入新村。2003年集资垫资500多万元，硬化全村道路67条，27万平方米，包括给水、排水配套工程，相继投资打深井5眼。2004年建造村门，2005年硬化桃源路4900平方米，2006年起建造外职、嫁城女安置楼7500平方米。2009年农改电投资200多万元，村民集资30多万元，重新安装全村线路及电力设备，保障了正常供电，为村民出租房屋提供保障。

其间，成功引进多家企业。“三森”家居集团公司占地200余亩，华汉房地产开发公司占地120余亩，城南客运站占地20余亩，各组的联营租地也不断扩大。至2009年底，全村土地全部出租或征用。

长安南路的拓宽，增设十几条公交线路，增加了本村的人气、财气，提高了本村的地位，繁荣了本村的经济。随着流动人口的大增，村民把原来二三层的农家小院增加到高层，其中6层以上占90%。目前全村村民建房面积为50多万平方米，门面房800余间，主干道已经变成商业街。超市、网吧十几所，招待所几十户，“六小行业”到处都是。

“造财不如造才，留钱不如留贤”。随着经济发展，家庭富裕，村人重视儿女教育。民国时期，全村仅有一两个高中生，也是富贵人家；新中国成立后进行“扫盲”，普及高小教育，村里逐渐培养出高中专生。改革后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初、高中生家家都有，每年都考上几个大学生，现在还考中几个研究生、博士生。

今天的东三爻堡新村常住人口2700多人，农户518户。地处雁塔边陲，毗邻长安，近邻长安南路，东邻公安小区，南接韦曲，西通雁环公路，北连绕城高速，长安大道南北贯通，所辖商家分布两侧，游目俯视，商贸云集，繁星拱月。新村门楼壮观，高层林立，街道规整，经济繁荣。民风淳朴，富裕祥和。有道是：和谐天景美，发展地理新。求真作强村，务实为富民。



## 东三爻村

位于西安城南，东与南窑村接壤，南与东三爻堡接壤，西邻长安南路。至2010年共890户，2445人，分为7个生产小组，面积约380亩。村中已无耕地。地处城镇结合处，交通便利，地理环境优美，自然条件良好。

据《陕西省西安市地名志》记载，唐朝时已在此建村。据《长安县志》和《咸宁长安两县续志》记载：东三爻村清代属咸宁县，民国初撤咸宁县并入长安县南关仓管辖。1935年左右，西安至长安公路南北贯通，为村民生活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有关史料记载，三爻村的村名由来与隋开皇二年隋太子左庶子宇文恺建大兴城有关。据宋代宋敏求《长安志》以及元代骆天骧《类编长安志》等史料记载：隋开皇二年（582），宇文恺兴建大兴城，以京城内横亘东西的六条高坡象乾卦六爻，故于九二置宫殿以当帝王之居。根据三爻村周围的地理环境，村南面和北面均有高坡横亘东西，村北的高坡，当地人俗称北岭，是鸿固原的一部分，按卦象推算属爻卦的第三爻，因此被称之为三爻。据宋代张礼的《游城南记》，城南门外的草场坡属第五爻。

大量考古发掘证明，一些民间传说并非空穴来风或子虚乌有，而是或多或少有其历史依据。东三爻村先祖也流传有关于东三爻村历史的一些说法。最早有赵姓和陈姓人家在此居住，但不知

是因战乱还是迁徙，村中现今无赵姓人家。至于村东现有几户陈姓村民，据说在东三爻村居住不过四五代人，从长安县迁来，与最早的陈姓人家并无关系。元代在村西建有杨武庄公茔。清嘉庆《咸宁县志》《长安县志》及宋联奎《咸宁长安两县续志》等史书均记载为三爻村。

自元代在村西建杨武庄公茔至今，杨姓占到全村人口90%，其余有陆、边、陈、田、郭、张等姓氏，约占10%。据现存清朝康熙壬戌年（1682）重修杨武庄公茔石碑，明代赵廷瑞、马理《陕西通志》及清道光年间贺瑞麟《三原新志》等史料记载：杨武庄公讳子江，龙桥（今陕西三原县）人，元世祖（忽必烈）中统纪元，元军攻襄阳城不克，杨子江献巨炮破城克之，官封便宜都元帅，获国进义武庄公。杨子江为东三爻村杨氏的先祖。三原县城内原有杨武庄公祠（址





在今三原电影院)，20世纪80年代在城市建

设中拆除。《三原新志》记载，杨武庄公祠当在今三原城隍庙东300米处。

东三爻村杨武庄公茔原占地约10亩，由于村中道路和私人宅基地等因素影响，墓地现不足5亩。坟茔正南有青砖砌成的门楼一座，高约5米，门楼上嵌有镌刻“元敕建杨武庄公茔”的石匾，并注清康熙四年（1665）和道光十七年（1837）两次重修。康熙壬戌年（1682）重修石碑碑记仍立于殿前，高约2.9米，碑上刻有杨氏第十五代至二十代子孙名录。前后两座大殿仍在。殿内原有元敕题“功在襄阳”木匾和嘉庆年间拔贡生杨芳灿（江苏扬州人）题“邻天尺五”石匾，均在村民家存放。据碑文记载，杨子江有四子，均在朝为官，长子德盛宣授炮手军匠征行元帅，次子德荣宣授炮手军匠元帅府镇武英烈公，三子德秀宣授军匠奥鲁元帅，四子德茂宣授进义校尉炮手万户府。后来四子德茂的后裔回原籍三原居住，其三子的后裔居三爻村繁衍至今。时至今日，村里杨姓村民仍有八家户、九家户和十家户的分系。如今户县太平河村，也系杨子江后裔中的一支，分别为头家户、二家户和三家户，清朝至民国年间每年都来东三爻村祭祖。到20世纪90年代初，三桥三民村（旧名鞞杨村）也有杨姓村民来东三爻村寻祖，并称其村杨姓系六家户、七家户的分系，至于其村杨姓的分户，也无人知晓是怎么个分法。

据现存碑文记载：元世祖中统纪元，由襄阳功封便宜都元帅，寻秩获国进义武庄公。由此可知，在攻破襄阳城不久，杨子江就被封为便宜都元帅获国进义武庄公。据《元史》记载，元世祖十年正月，襄阳城守将吕文焕降，坚守五年左右的襄阳城破。根据中国历史年表，元世祖在

位36年，其中中统5年，至元31年，元世祖十年当为至元五年（1268）。杨子江在元世祖时立下战功，不太可能在相隔六七十年后由元顺帝封公修茔。2003年《雁塔区志》载，元顺帝（1341—1367）手谕修建杨武庄公茔，不知根据什么资料，不解。

陆姓村民，从其年长者口中略知，其祖上大致于明朝在东三爻村居住。新中国成立前，在今市劳教所内曾有陆氏先祖坟茔，有青砖砌垒壁楼。碑上曾有“大明朝”等字样，详细名称已无人记清，俗称“方壁楼”。陆姓乃避战乱或逃难至此，原籍何处已不可知。村里祖辈称陆家人居住的地方叫“陆家崖头”，可知当时是在土崖底下能挖窑洞、避风雨的地方居住。如今陆姓村民主要居住于村东第七小组，和兰州军区通讯二站相邻，人口约占第七小组人口60%。

边姓人家，由于年代久远，“文化大革命”时家谱毁损，其家族已无人知其渊源，何时定居也无人知晓。边姓人家均在村东第七小组居住生活。

郭、张二姓大都是抗日战争时期从河南的黄泛区逃难至此，有的则是国民党溃逃时不愿走的国民党旧兵。当时东三爻村有杨氏三大户。各户均有祠堂、公房等设施，逃难来的居民就在此处居住下来，现均住在第五小组。

其余的田、麻、刘、王、高等姓氏人家大都是新中国成立前从外村、外县迁来。当时曾在东三爻村干活或替人看守墓地，新中国成立后留住。

新中国成立初东三爻村仍归长安县第四乡管辖，当时乡机构就设在本村杨逢永家对面的简易房内，1954年雁塔区成立，东三爻村随之划归雁塔区管辖至今。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



东三爻村出现农会组织。1952年成立互助组，全村约700人，不超过200户，土地约1400亩。1955年，成立初级社，1956年成立高级社和东三爻堡同属一个大社。1957年实行一平二调刮共产风，东三爻村250亩土地划拨给东三爻堡。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才与东三爻堡分开。全村分为4个生产小组，每组人口约200人左右，人均土地1.5亩。由大队统一管理4个队的生产资料，统一分配。据时任村电工陆成信讲，1956年村里推荐其上电力学校1年，1957年回村当电工。同年东三爻村通电，家庭通电约在1963年。1959年下半年至1962年自然灾害，生产队开始独立核算，由建社初的半蔬菜半粮棉的生产模式转变成全粮棉生产队。1963年第一次和1964年第二次社教运动以后，由4个生产小组分为7个生产小组，延续至今。

“文化大革命”中的1966年至1972年，东三爻村曾更名为代代红大队。

据任过村支书的杨逢义讲，新中国成立初村中无党组织。1958年以前党员开会都是和几个村如南寨子、瓦胡同、姜村等在一起，支书由上级部门指派担任。

东三爻村村民世代靠种地生活。据村里年长者及时任村干部回忆，新中国成立初全村有36挂大车，骡子113头，在当时城南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大村和富裕村庄。有众多的车马与东三爻村祖辈从事贩稻子生意有关。至于这一生意从何时开始，就连祖辈的祖辈也无从知道。当时村人忙完农活农闲时，在长安县、户县及周至一带贩回稻子，经过碾、扇加工成大米，再卖到城里粉巷等处的米店，赚取利润，补充家用。全村杨姓村民中有80%做此生意。20世纪50年代初，仍有人在做。由于贩卖稻子，因此村里石碾、木风车

等物品较多，新中国成立后从建立互助社到成立公社分队，各个小组基本上都有石碾、风车、骡马。当然也有少许生活困难的家庭，没钱做买卖，只能在农闲时做个小本生意，或在农忙时帮人做工赚钱，维持家用。

听老人们讲，东三爻村的锣鼓活动在城南仅次于瓦胡同村。每到正月十五大雁塔庙会、清明时节祭祖等日子，都会敲打起来，活跃村民生活氛围。根据一些年长者的记忆，有村民整理出当时本村敲打锣鼓的十余种曲牌调子，作为文化遗产保存起来。

村民一直非常重视孩子们的教育问题。新中国成立前，家庭情况稍好的人家，利用杨氏各户的公房，联合开私塾，请老师，用各家分摊的方法解决先生的酬金。据村中年长者回忆，当时私塾先生有杨崇时、杨润芝、杨清敏、杨华甫等近20人。直到1940年，由当时在城里做文化用品生意的本村人杨玉山出面，在城里联络政界、军界和商界的重要人员出资出力，并且自己捐赠3000元及文化用品等财物，用本村杨氏三大户祭田74亩多的地价，在本村慈应寺的寺庙中创建了东三爻村小学，也即现在东三爻村小学校址。

据史料记载，慈应寺“在城南东三爻村，明正统年间（1436—1449）建，崇祯四年（1631）增修，皇朝嘉庆七年（1802）重修。大学士韩城文端公王杰撰碑记”。当时的建校石碑“文化大革命”后尚在，现已不知下落。

在东三爻村，过去也有不少庙宇。据老人回忆，当时村内有三官庙、文昌庙、娘娘庙等多达十几个，烧香拜佛、祈福求愿成为村中群众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近几十年来，随着村庄的发展，这些庙宇都不复存在。





## 柳

(唐) 李商隐

曾逐东风拂舞筵，乐游春苑断肠天。  
如何肯到清秋日，已带斜阳又带蝉！

**【注释】** 乐游：乐游原的省称，也叫乐游苑，在唐代长安东南，今西安市郊。

### 【赏析】

这是借咏柳自伤迟暮、倾诉隐衷的一首七绝，诗人借柳的形象来自比，抒发情感。

诗写的是秋日之柳，但诗人不从眼前写起，而是先追想它春日的情景，然后再回到眼前的柳上来。一、二句“曾逐东风拂舞筵，乐游春苑断肠天。”意为春日细长低垂的柳枝，随风轻扬，最易使人联想起舞女的飘然舞姿。这个“舞”字，形象地表现春柳的婀娜多姿，同时，又把柳枝与热闹的舞筵结合起来，更加衬托了柳枝的欢乐。“拂舞筵”三字，仿佛使人看到柳枝同舞女一同翩翩起舞的场面，分不清谁是舞女，何为柳枝，两者互衬，优美动人！本来是东风吹得柳枝飘动，诗中却用一“逐”字，说柳枝在追逐东风，变被动为主动，写出柳枝的蓬勃生气。对句又紧接舞筵，从时、地两个方面加重描绘，说明这不是一般的舞筵，而是春日乐游苑上的舞筵。“断肠天”指繁花似锦的春日，“断肠”即销魂，言花之色香使人心醉神摇。春风荡漾，百花争艳，长安乐游苑上，士女如云，舞筵上觥筹交

错，歌管迭奏，红裙飘转，绿袖翻飞，碧绿的柳枝，同舞女一道翩翩起舞，好一幅春光明媚，繁花似锦的场景。

三、四句“如何肯到清秋日，已带斜阳又带蝉！”却陡然一转，描绘出杨柳完全相反的另一景象。“清秋”，喻秋色已深；清秋又当斜阳，环境更加凄凉。临近生命终结的秋蝉，鸣声更加凄厉。本来是斜阳照着柳枝，秋蝉贴在柳枝之上哀鸣，诗中却用两个“带”字，反说柳枝“带着”它们，此与第一句中的“逐”字一样，又使柳枝由被动变为主动，化客观死景为活景，表现出秋日之柳的不幸。第三句既是反诘，又是感叹，同时又是转折。“肯”字或释为“会”（见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但如果解作肯不肯的“肯”，诗意似更深邃：既然秋天是如此萧条，那你（柳）为何又肯捱到秋天来啊！言外之意是说，不到秋天来，大有悲不欲生之痛。此处的转折，用了“如何肯到”这样顿挫有力的明转，增强了对比感。春日之柳的繁盛，正反衬出秋日之柳的枯凋；春日愈是繁华得意，愈显出秋





日的零落憔悴。诗正是通过这种强烈的对比描绘，来表现对秋柳稀疏衰落的悲叹之情。两句中，虚字运用亦很精妙。第三句“如何”、“肯到”连用，可反诘、感叹语气更加强烈。结句“已带”、“又带”，更是层层推进。

这首诗中“柳”的形象被刻画得生动饱满、跃然纸上，产生这种效果主要是因为诗中综合运用了多种手法。

一、诗人在刻画“柳”这一形象时，多处运用了拟人的修辞手法。春日柳长，迎风摆动，但诗人并没有直接描写，而是赋一“逐”字，把柳人格化。再加上“拂舞筵”三字，更易让人联想到那迎风而动的柳条就是一位酒筵之上翩翩起舞的美女，翠袖绿裙，左摆右摇，煞是好看。可谓将拟人手法运用得深入无痕。第三句一个“肯”字又是把柳作人写。第四句两个“带”字也分明是将柳写作人。诗人把斜阳照柳，秋蝉鸣柳反说成“带斜阳又带蝉”，这一反，却将柳的形象凸现出来了。

二、巧妙地运用对比，是此诗的另一特色。诗的前两句着力刻画春日之柳，写春柳的万条丝绦随风舞动，写乐游苑的繁花似锦，也写到了春日乐游苑舞筵的热闹盛大。似乎让人置身其中，令人感到春光融融、舞袖飘飘。总之，呈现的是一派热闹的景象。诗的后两句则极言秋日的凄清。秋是清秋，阳是斜阳，蝉是寒蝉。一系列的凄冷意象组合成凄冷的秋景。前后对比鲜明，反差极大，给人情感上造成巨

大的冲击。

三、虚词的妙用。全诗二十八字，共有虚词五个：曾、如何、肯、已、又。而这五个词在诗中都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没有“曾”则看不到昨日之柳、春日之柳的情状，那么秋日之柳就少了一层铺垫，少了一层对比。没有“如何”、“肯”，则柳的形象就不够生动，反诘的语气也不够强烈。“已”和“又”本身构成并列关系，这里，两者连用，似又带有递进一层的意味，把柳在秋日的凄清写得入木三分。五个虚词的使用，不仅使表情达意愈加准确，更是让人感到意味蕴藉，回味无穷。

四、象征的运用。这首诗也不例外。诗人写春日之柳，写秋日之柳都是有所寄托的。所谓借咏柳“自伤迟暮、倾诉隐衷”是也。春日之柳正是当初风华正茂、春风得意、胸怀天下的诗人的写照，而秋日之柳则是长期沉沦下僚、生活维艰、飘沦憔悴的今日的诗人。诗人没有直接倾诉自己的身世之感，而是借柳这一形象来表达，含思婉转，藏锋不露。言近旨远，言有穷而意无尽，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从创作的角度来看，诗人在选材构思上是颇下了一番工夫的，“柳”意象的选择，对比、拟人手法的运用等无不匠心独运，但是又让人感觉不到雕琢的痕迹。正所谓精雕细琢，浑然天成。

更正：

1. 本刊2016年第四期第4页“古代长安的地记——《游城南记》”中《宝颜堂秘笈》应为《宝颜堂秘笈》；
2. 本刊2016年第四期第5页《一诺千金》中的“《史记·季布来布列传》”，应为“《史记·季布栾布列传》”。





## 岁暮归南山

(唐)孟浩然

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  
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  
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  
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

### 【赏析】

《岁暮归南山》是唐代诗人孟浩然的诗作。此诗系诗人归隐之作，诗中发泄了一种怨悻之情。首联两句记事，叙述停止追求仕进，归隐南山；颔联两句说理，抒发怀才不遇的感慨；颈联两句写景，自叹虚度年华，壮志难酬；尾联两句阐发愁寂空虚之情。全诗语言丰富，层层辗转反复，风格悠远深厚，韵味无穷。

唐玄宗开元年间，四十岁的孟浩然第一次来到京都长安，结识了当时许多著名的诗人，如张九龄、王维等。张九龄是当朝宰相，王维也是朝廷命官。孟浩然参加了进士考试，并在当时全国最高学府“太学”赋诗，得到了包括张、王在内的许多著名诗人的赞赏，也流传着孟浩然让皇帝“栽跟头”的故事。有一天，孟浩然参加完进士考试来到王维处，不料皇上唐玄宗突然驾到，孟浩然只好躲到床下。王维不敢隐瞒真情，告诉有位诗人躲在床下，唐玄宗得知是孟浩然，因为久闻大名，就让他出来，当场献诗一首。孟浩然选出他认为最成功的一首诗《岁暮归南山》，当皇上听到“不抛弃你呢？”十分不悦，唐玄宗回去后，生气地下了一道指令不能让孟浩然做官，只能回去过隐居生活。诗人在诗中自怨自艾抒写自己仕途失意的愤闷，表达了自己未遇明主及对

世态炎凉的幽怨、哀伤，反映出压抑人才的封建社会带给有志之士的痛苦。全诗委婉含蓄，感情复杂深刻，感人至深。

落第后的孟浩然有一肚子的牢骚而又不好发作，因而以自怨自艾的形式抒发仕途失意的幽思。这首诗表面上是一连串的自责自怪，骨子里却是层出不尽的怨天尤人；说的是自己一无可取之言，怨的是才不为世用之情。

字面上说“北阙休上书”，实际上表达的正是“魏阙心常在，金门诏不忘”的情意。只不过这时他才发觉以前的想法太天真了；原以为有了马周“直犯龙颜请恩泽”的先例，唐天子便会代代如此；现在才发现：现实是这样令人失望。因而一腔幽愤，从这“北阙休上书”的自艾之言中倾出。明乎此，“南山归敝庐”本非所愿，不得已也。诸般矛盾心绪，一语道出，令人读来自有余味。

三、四句具体回述失意的缘由。“不才明主弃”，感情十分复杂，有反语的性质而又不尽是反语。诗人自幼抱负非凡，“执鞭慕夫子，捧檄怀毛公，感激遂弹冠，安能守固穷！”他也自赞“词赋亦颇工”。其志如此，其才如此，不谓“不才”。因此，说“不才”既是谦词，又兼含了有才不被人识、良骥未遇伯乐感慨。而这个



不识“才”的不是别人，正是“明主”。可见，“明”也是“不明”的微词，带有埋怨意味的。此外，“明主”这一谀词，也确实含有谀美的用意，反映他求仕之心尚未灭绝，还希望皇上见用。这一句，写得有怨悱，有自怜，有哀伤，也有恳请，感情相当复杂。而“多病故人疏”比上句更为委婉深致，一波三折；本是怨“故人”不予引荐或引荐不力，而诗人却说是因为自己“多病”而疏远了故人，这是一层；古代，“穷”、“病”相通，借“多病”说“途穷”，自见对世态炎凉之怨，这又是一层；说因“故人疏”而不能使明主明察自己，这又是一层。这三层含义，最后一层才是主旨。

求仕情切，宦途渺茫，鬓发已白，功名未就，诗人不可能不忧虑焦急。五六句就是这种心境的写照。白发、青阳（春日），本是无情物，

缀以“催”“逼”二字，恰切地表现诗人不愿以白衣终老此生而又无可奈何的复杂感情。

也正是由于诗人陷入了不可排解的苦闷之中，才使他“永怀愁不寐”，写出了思绪萦绕，焦虑难堪之情态。“松月夜窗虚”，更是匠心独运，它把前面的意思放开，却正衬出了怨愤的难解。看似写景，实是抒情：一则补充了上句中的“不寐”，再则情景浑一，余味无穷，那迷蒙空寂的夜景，与内心落寞惆怅的心绪是十分相似的。“虚”字更是语涉双关，把院落的空虚，静夜的空虚，仕途的空虚，心绪的空虚，包容无余。

这首诗看似语言显豁，实则含蕴丰富。层层辗转表达，句句语涉数意，构成悠远深厚的艺术风格。

字词文化趣谈之典故史籍

## 江郎才尽

释义：江郎，南朝梁文人江淹，少有文名，晚岁文思衰；才：才华；尽：完。江淹的文思已经衰竭。后比喻人的文思枯竭或才气用完了。

出处《南史·江淹传》尝宿守冶亭，梦一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吾有笔在卿处多年。可以见还。”淹乃探怀中，得玉色彩笔以授之；尔后为诗，绝无美句，时人谓之才尽。

江淹，字文通，他年轻的时候，就成为一个鼎鼎有名的文学家，他的诗和文章在当时获得极高的评价。可是，当他年纪渐渐大了以后，文章不但没有以前写得好了，而且退步不少。他的诗写出来平淡无奇，而且提笔吟哦好久，依旧写不出一个字来。偶尔灵感来，诗写出来了，但文句枯涩，内容平淡得一无可取。于是就有人传说，有一次江淹乘船停在禅灵寺的河边，梦见一个自称叫张景阳（本名张协，与其兄张载、其弟张亢，均是西晋有名的文人，时称“三张”。）的人，向他讨还一匹绸缎，他就从怀中掏出几尺绸缎还他。因此，他的文章以后便不精彩了。

又有人传说，有一次江淹在冶亭中睡午觉，梦见一个自称郭璞的人，走到他的身边，向他索笔，对他说：“文通兄，我有一支笔在你那儿已经很久了，现在应该可以还给我了吧！”江淹听了，就顺手从怀里取出一支五色笔来还他。据说从此以后，江淹就文思枯竭，再也写不出什么好的文章了。





## 中共西安市委办公厅组织召开 《中国共产党西安市地方组织志》编纂工作会议

9月6日，市委办公厅组织召开《中国共产党西安市地方组织志》编纂工作会议。市委副秘书长纪刚到会并讲话，市委办公厅、市纪委、市委组织部等15家承编单位主笔近20人参加会议。会议邀请市地方志办区县志处处长（该志责任编辑）王耀珍就该志后期审阅修改应把好政治关、资料关、文字关进行专业指导。会议由市委办公厅副巡视员（该志副主编）吕哲民主持。

主笔就如何提高该志质量，大家进行了研讨，提出该志审阅修改中一些难点，王耀珍处长逐一作了解答。针对该分志（征求意见稿）存

在问题，纪刚副秘书长提出几点要求：第一、思想认识要到位，要本着质量第一意识，本着对历史负责态度，牢记责任重大，要有担当精神。主笔和分管领导要层层审核把关。第二、履职尽责。按市志办行文规范要求对志稿精雕细刻，要有匠心之作。把修志工作做到极致，手中出精品。第三、失责要问责。编纂志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文责自负，任何一个同志都不要出这方面问题。要认真地一遍一遍审阅、修改，只要“上心、用心、精心”，就能“划圆满句号，交合格答卷”。

（中共西安市委办公厅）



## 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移动地情资料库开发与建设项目》建成并通过验收

9月23日上午，由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组织建设的西安市地方志《移动地情资料库开发与建设项目》建成并通过验收。

移动地情资料库依托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现有的西安市地情资料数据库和西安地情网的数据内容和架构，对其进行移动互联网方面的扩展，其移动地情门户网站、西安方志服务号、掌上志鉴、西安地方志服务平台组成了西安市地方志移动互联网系统的核心内容。广大用户可通过手机关注微信公众号“西安地情”或“西安方志”，访问“西

安地情网（移动版）”，点击西安地情、西安方志、地情博览，随时随地了解西安的历史文化与现状；也可在书籍浏览页点击下载“掌上志鉴”，进行网络版和原版志书、年鉴及地情丛书等的查询、阅读及下载。该项目的建成，标志着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信息化建设步入移动互联网时代，探索开辟了一条既有自身特色，又便捷高效的信息化建设的新渠道。下一步，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将对项目进行后续推介与宣传，使更多用户知晓移动地情资料库，使用移动地情资料数据



## 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领导调研周至县二轮修志工作

为加快推进西安市二轮区县志编纂工作，9月6日，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张帜等一行3人，赴周至县开展调研。周至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张荣幸携《周至县志》编纂人员共7人参加本次调研，并进行了深入讨论。首先张荣幸汇报了周至县地方志办公室机构和人员配置，以及近期修志工作的进展情况，尤其对二轮县志编纂过程中存在的困难、不足做了重点汇报。在交流中，市地方志办公室紧密结合周至县地方志工作实际，实地查看修志成果，并逐一听取了县志编修人员的工作汇报。通过与一线修志人员沟通，深入了解了各个编辑目前承担的修志任务和工作中存在的难点、困惑，有针对性地给予了指导和答疑解惑，及时全面地掌握了周至县修志工作存在的问题。

张帜副主任最后总结时充分肯定了近阶段周至县地方志工作取得的成绩，尤其是张荣

幸主任上任以来逐一赴县志各承编单位沟通和指导修志工作，迅速进入修志状态，但按照西安市区县二轮修志工作的总体进度安排来看，周至县二轮修志工作进度缓慢。针对调研中发现的问题和不足，从三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第一，进一步加强领导重视，严格贯彻《地方志工作条例》和《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省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的通知》文件精神，在人员经费等方面给予地方志工作支持；第二，落实《西安市第二轮区县志编纂任务目标责任书》要求，加强对县志各承编单位的指导和督促，加快修志步伐；第三，进一步加大对修志人员的培训力度，提高各承编单位编辑的修志业务水平，为确保志书质量夯实基础，进一步推动地方志工作可持续发展。

库，为广大百姓和读者了解西安地情、了解西安悠久的历史，提供在线及线下服务。

《移动地情资料库开发与建设项目》验收会议邀请信息化专家进行评估验收，西安市工信委相关人员到会指导，市地方志办领导班子、各处负责人参会。市地方志办党组书记、主任曹永辉在总结发言中指出：地方志系统深入开展信息化建设，是时代的召唤，也是地方志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移动地情资料库开

发与建设项目》的实施，对于提升我市地方志工作信息化水平，加强网络舆论阵地建设，推进依法治志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下一步市地方志办公室将充分利用信息化建设，不断强化地方志“存史、资政、教化”功能，不断丰富地方志公共文化服务手段，为西安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发展担当起应有的责任，做出应有的贡献。

(西安市办公室信息中心)





## 东瀛掠影

彭栋为

丙申之春，三月初始，适值上巳（农历三月初三）前后草长莺飞、柳绿桃红春意盎然之时节，予偕妻再次跨出国门，随同一三十余人之旅行团队，由西安直飞日本大阪，开始了对日本国本州岛中西部之大阪、京都、东京、横滨、名古屋、奈良及其岐阜、高山、松本、千叶、静冈、神奈川等市县为期一周的浮光掠影式的短暂观光旅行。虽说是走马观花，来去匆匆，但足履之处，耳闻目染，见微知著，还是深深地领略了日本这个近在我们咫尺的邻邦的不同凡响与可敬可畏。

此次赴日旅行，本是奔着樱花之季去观赏其驰誉世界之“国花”的天姿国色的，但可惜去日稍晚，花期刚过，即便物候略后一些时日的本州中部山区尚有不具规模之盛期樱花可观可赏，却终究没有留下多少值得徘徊不舍、流连忘返的印记和回味，倒是对于这个国度绝佳的环境与国民良好的素质，留下了至深的印象。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

旧时的日本被我们称为扶桑或樽桑（神话中海外的大树，据说太阳从这里出来），因地缘甚近，故而被我们喻之为“一衣带水”的邻邦。但这个位于亚洲东部的国家却仅仅只是

地理概念上的亚洲国家而已，事实上它自内而外、脱胎换骨般的都应算是完全“脱亚入欧”了的亚洲中的欧洲，东方里的西方。就国家层面的方方面面实力而言，他都较诸西方最老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亚洲众多的国家就更无一能与其比拟并论，更毋庸说分庭抗礼和超越于它了。日本的国土面积略等于我们国家的二十五分之一，人口总数也不及我国的一成。然而空间的狭小和资源的贫乏非但没有制约束缚其奋勉壮大，反而成为砥砺他愈挫愈勇、一往无前的磨刀石。实际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日里，日本都一直紧随美国之后，成为令德意志和英吉利等西方最发达国家皆羡慕嫉妒而又望尘莫及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近几年我们国家赶上并代替了它的位置，但它也只是由老二易席为老三的微乎之差，而且这种微调也没有丝毫改变它原本就领先于德、英、法、意诸国的事实。话再说回来，我们虽然业已跻身于这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若以13亿的人口之数来破除这个世界第二大的经济总量，则心知肚明，哪里还有嘚瑟、自傲的范儿！

日本这个民族有诸多的过人之处，酷爱学习并善于取人之长就是其一大优点。隋唐时



期，日本政府曾先后派出了十三批遣唐使历尽劫波和险阻，赴唐都长安心无旁骛地受教学习，诗仙李白就曾经以一首七言绝句缅怀过遣唐使中一位堪称为佼佼者的阿倍仲麻吕（中国名晁衡）之人。时至今日，日本的文字系统仍然保留着相当一部分彼时取自中国大唐的汉字（顾名思义，这些字的含意几乎未曾有变，只是读音有异而已），日本的奈良与京都两座城市迄今依然各自保持着唐代长安和洛阳的城市建筑格局，日本人的饮食服饰、礼仪举止以及他们的茶道、花道、和服与相扑、柔道等技艺，无不映现折射出唐代文人雅士、显宦贵族的情趣与风尚。鸦片战争英帝国主义国以坚船利炮攻破了满清王朝闭关锁国的海疆关门以后，日本如梦憬悟，很快意识到封建中国的古老文明已经如明日黄花衰落过时，犹如银样镗枪头一样中看而不中用，迅疾改弦更张，维新图强，走上学习西方科教兴国、殖民拓疆的发展之路，并一改以往为生为徒的卑微和谦恭，反过来接二连三地狠揍起昔日的老师，从而把这个所谓的“天朝大国”一步步拖入瓜分豆剖与蚕食的泥淖和深渊，直至肢解剖裂得遍体鳞伤、体无完肤而不罢休。撇开历史的恩恩怨怨，你无论说这个民族前恭后倨、以德报怨，还是忘恩负义、崇强凌弱都没有错。然而这个民族之所以能有今天，概因它自身有着与时俱进、通变图强等诸多过人的长处亦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知彼知己，知耻后勇而发愤图强，扬长克短，使自己的民族永远蓬勃强劲地立于不败之地。事实上早在一百年前，我们国家的一些有识之士就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与日本的巨大差距，从而

放下挺直的身板和高傲的头颅，浮槎东渡，拜师讨教，如饥似渴地学习其舶自西方而又假手给我们的科技文化等现代性东西。孙中山、蔡元培、章太炎、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恩来、蒋介石等即是这批人中的先驱、巨擘与精英。至今仍然为我们所广泛应用着的现代汉语中的大量词汇以及诸多的现代管理理念、制度与知识，也都是那个时期有赖日本的所赐所教。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日本自明治维新改换门庭学习西方以后，又反徒为师，后来居上地成了近现代以来我们的启蒙老师。

此次的日本之行，我曾切实感受到日本人的环保意识之强。我们所到之处，不管是人潮如蚁的繁华都市，还是万籁俱寂的乡野村庄，他们的生态环境和空气质量都无一例外地良好。来往疾驰或缓慢而行的汽车闻不着刺鼻呛人的尾气，工厂高高的烟囱喷薄而出的不是滚滚黑烟，而是如雾像云随即便融入空气而无影无踪、了无痕迹的气体。据说他们将性能最好、燃油最佳的车子只留给自己的国民使用，汽油的冶炼技术好纯度高，自然也就减少了污染气体的排放。沿途所见之河流湖泊清澈见底，晴日的天空湛蓝如洗，纤尘不染，花草树木皆尽其生长，葳蕤茂盛。我们行经的飞猱山区树木参天，植被茂密，几乎看不到裸露之土。他们的一草一木都不轻易砍伐，全力保持其原生状态。他们也使用一次性筷子，据说却是购自我国，而且用过后全部回收，打成纸浆再反过来卖给我们。康衢闹市或乡野小道根本找不出随丢乱扔的烟头、纸屑或痰便一类的秽物。他们的垃圾分类严格仔细到“繁文缛节”





甚至可以说是极其苛刻的程度，以至于让我们颇感困惑且无所适从。日本人遛弯散步，习惯于走累了便释然席地而坐，稍事小憩，因为他们有这个底气和自信。哪里像我们“八百里秦川，黄尘遮天”（当然这已是过去的写照）；十面“霾”伏，就等你就范。你坐下来试试！

谦恭礼让，热情好客已是当今日本社会的一种常态。虽然目下的中日关系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但看日本的国民百姓似乎一切像以往一样正常，他们的情绪依然安之若素，好像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或许他们城府甚深，喜怒不形于色，而在骨子里瞧不起我们。但他们的彬彬有礼，温文尔雅，以及他们的笑脸和热忱，又实在看不出做作伪装、口是心非的成分和痕迹。无论是酒店、餐厅还是商场、景区，服务人员皆频频对你点头哈腰，笑容可掬又谢意连连。未去之前吾妻同事皇甫老师的女儿说起她前几年赴日旅行，一次在东京的公共汽车上为一位年逾七旬、手拄拐杖的老人让了一个座儿，不意这位老人竟然近乎九十度地弯腰，一连给她鞠了三个躬，让她颇不心安。此次在高山县内的一个晚上，按行程安排我们去温泉泡汤，进去入电梯上楼时我没搞清楼层便按了四楼，正当走出电梯茫然无措之际，楼下的工作人员约有五六十岁年纪的一个老妪竟循着电梯撵了上来，引导我走入正确的地方。也因为这个老妪站在近旁，我不好意思脱光衣服，挎着裤头便要进去。老女人看见后急忙跑到我跟前连比带划，满脸微笑着耐心地示意我必须脱光了全裸着才能进去。我不好意思，她倒好像我不是一个男人一样波澜不惊，安之若素，其服务意识与耐烦之态，着实令人钦佩。我们常

说我们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这话放在过去百分之百正确，若以今日“礼崩乐坏”、人心不古之情形验之，恐怕我们自己都心里没底吧！

日本人格守规矩似嫌呆板，崇尚秩序近乎教条。中小學生上学的路上汇合后便自觉排成一列小的在前、大的在后的纵队，紧靠着道路的左侧一边依次而行，再汇入新的成员便依样再予以排列，绝无乱象。上班一族虽然脚步匆匆、急速而行，但均据步道的一侧行走，乘电梯亦是如此，绝不乱站而有碍事更急者的超越。至于拉手提箱则更有讲究，用哪个手拉和人在箱包的哪一边，都有约定俗成、大家共遵的规矩可循。开车的人遇到红灯，即便无车无人也绝不闯行，若逢阻滞则耐心排队等待通过，绝无加塞和寻隙超越现象。行人遇到红灯亦然，须候至灯变方迈开脚步。驾车人在没有红绿灯设置的地方见到行人等候通过，必减速停车伸手示意行人先过，你若客气，他仍坚持让你。公共场所、车站码头乃至摩肩接踵、人流如潮的地铁内，举凡不需要开口动嘴的地方，日本人均老老实实在地管控着自己的嘴巴，以至于“蜂拥蚁聚”、人头攒动却能做到鸦雀无声。即便是猝然遭罹不可抗拒的地震海啸等灾难，普通的百姓，无论男女老幼，也能做到从容镇静，不慌不躁和秩序井然。其处变不惊、隐忍自律，着实令人折服和钦佩。你也许不理解他们，甚至还会讥笑他们的近乎痴傻，不懂变通，但恰恰又是此种锲而不舍、痴心不改的“傻帽痴愚”成就了日本国民严谨认真的民族性格和精神。

日本人普遍敬业，团队精神可嘉。凡是自己供职从业的企业和单位，他们必以身相许，





倾心报效，其勤勉劬劳“虽九死而犹未悔”的虔敬和忠诚，比之孝敬父母与对待两肋插刀的朋友，一点都不逊色，仿佛他们自己的利害生死自入门加盟之日肇始就已同投身的企业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地捆绑在了一起。上班时间，所有的员工都是企业这台机器之中的一枚螺钉或一个部件，多一个不行，少一个更不行，大家精诚团结又各司其职地呕心沥血、拼命工作，最终的目标就是让这个企业和它的产品日臻发展，做强做大，已至在世界一流的品牌和企业中稳稳地居一席之地，长久地享有一把交椅。综观日本之驰誉世界的企业，枝繁叶茂而臻数百年者，员工的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和全力以赴，不能说不是一个至关重要而不可或缺的人为因素。

对于国民尤其是学生的教育，日本也有可资我们的借鉴之处。幼儿入园，老师即培养他们的自理能力与自立精神。自入园之日起，他们便自觉承担起抹桌子擦地板以及涮洗碗碟、收拾床铺的事务。也自入学开始，他们便拒绝家长相送，（当然，家长也不会宠她们送他们）。再有钱的父母都不会显摆炫富，以豪车载子女上学。学校不允许家长这样做，子女学生则更以此为耻。日本的学生自幼儿园而至初高中，只用一个国家专为他们设计定做的全国都一样的书包，当然，这样的书包在不同的年龄段所装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幼儿时期，书包里可能就有玩具一类的东西。他们的校服也是一个式样，你家就是日进斗金、富可敌国也不能搞特殊，必须穿着这种校服入学，否则，对不起，你就不用上学了吧！据说日本学生使用的书包具有一种特殊功能，学生不慎摔倒了，

它可以防护学生的后脑和脊椎不致损伤，如若突然落水，它则可以充当急救衣而不使他们溺水身亡，小小书包竟如此神奇，何虑之周矣！日本的教育理念一以贯之，要求学生和国民自尊自立，不义之财不贪不取，不到山穷水尽、万不得已，绝不给别人添麻烦。因此，他们的国家几乎鲜有坑蒙拐骗、乞讨抢劫一类谋财害命、弄奸使诈的丑恶发生。即是一时衣食无着的失业者和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也都羞于去领国家的救济补贴。日本的学校也对学生实施爱国主义教育，但其教育不尚空谈，更注重实际效果。据说他们的学生自小学而至高中，学校要组织他们走遍自己国家的山山水水，使他们用眼睛用心灵去领略去感受自己国家山川大地的壮美和历史文化的灿烂。我们在日本的一周里，就曾在岐阜县白川乡的合掌村（此村地处深山，冬季多雪，为防止房屋被大雪压垮，房脊两边的坡檐搭建得非常陡峭，型似人合掌之状，故名。此村已入列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横滨海港码头和奈良大阪公园中的东大寺（唐代高僧鉴真东渡说法讲经处）等处，数次看到过一队队一车车的中小學生专程前往参观的场面。

资源匮乏和地震频发，铸就了日本民族超强的忧患意识与危机意识，同时也造就了日本民族殊为可怕的另类特质。他们的基础设施如道路桥梁等足可抗御八九级地震，前几年曾发生于本州岛的一场八级余强震，硬是没有震破大阪关西机场候机楼的一块玻璃，令人纳罕叫绝。为预防地震的破坏，日本的酒店、民居等一律采用轻型材料来建造，这样的房子遇到地震，就是坍塌下来也不会致人于命。我所就住



的一个酒店的墙壁曾被一个醉汉一拳砸了一个窟窿就是一个明证。日本民族对于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目光聚焦的前瞻性非常长远。东京的地下排水系统足以与法国的巴黎相媲美，维修巡查的工人可以开着大卡车径直驶入，即是遭逢百年不遇甚或再大一些的暴雨洪涝，他们的城市都经得起考验，并会一如既往地安然无恙，更不至于遭罹灭顶之灾。在预测到五十年内东京所处的本州岛中东部一带将有可能发生较大地震的情况下，日本朝野已经紧锣密鼓、未雨绸缪地做好了国都的备份准备，一旦地震暴发，京城瘫痪，国家机器将顷刻间在大阪及时运转起来，国家的中枢系统一点都不会缘此而中断，你说日本人厉害不厉害，算不算深谋远虑？日本地域狭小资源匮乏不假，但不是没有资源，他们的所有山地林木茂密，尤其是北海道一带更是森林遍布，林莽无边无际，林木资源极为丰富。日本素为世界三大渔场之一，渔业资源数一数二名列前茅。他们也有矿产，但为子孙后世谋，他们就是讳莫如深，秘不示人，藏着不予开发。那种竭泽而渔、杀鸡取卵、吃子孙粮之鼠目寸光的短视行为绝不是日本人的取向和选择。

然而日本人的长图远虑，换言之也可以说是处心积虑，也着实令人吃惊和惧怕。他们千方百计以低廉的价格从我国购进为世界所稀有的稀土矿产，把它全部储藏起来以备后世使用。与此同时，他们还从澳大利亚巨量购进铁

砂矿，并原封不动一点不少地一船船径直倾倒入进北海道附近的海中埋藏起来。即是吃穿用度、日常生活的诸多物件，他们也是多多益善，能储就储。因此，他们才非常自信且不自豪地宣称：日本国可以在未来的五十年里，可以不进口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与地区的东西而足以自给自足，安居无忧。联系到近期为西方媒体所披露的日本域内目下所储存的核原料足可以制造出数百枚核弹头的爆料，以及安倍其人频频导演的“购岛闹剧”、解禁自卫权、实施安保法与不断滋事挑衅、挑战我们底线的种种行径，不能不让我们对这个近在我们卧榻之侧而又居心叵测的民族的无比忐忑和忧虑。虽然害人之心不可有，但防人之心却不可不有，尤其是对于像日本这样对于过去铁板钉钉一般的侵略事实都能矢口否认、毫无悔意的国家，我们更不可存有丝毫的侥幸和幻想。殷鉴不远，覆车犹在，我们宜当博采众长，吸纳借鉴当今世界各个民族尤其是我们这个近邻日本的种种优长，从而“师夷长技以制夷”，“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确保我中华民族国运长盛，永世无虞。

（作者：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退休干部）





9月23日上午，由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组织建设的西安市地方志《移动地情资料库开发与建设项目》通过专家验收。



参加《移动地情资料库开发与建设项目》验收的专家。



9月14日，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全体人员与共建单位刘家社区举行“迎中秋，庆团圆”文艺联欢会。





2016年第五期（总第242期）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王少周公恐天下畔乃踐祚代成王攝行政事  
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  
使其子伯禽就封於魯管蔡武庚等果將害  
命興師東伐作大誥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



## 西安地方志

主 办 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地 址 西安市凤城八路109号  
 市政府大院26号信箱  
 邮 编 710007 电 话 029-86788731  
 邮 箱 xadfz@sina.com  
 changannan6861@sohu.com  
 网 址 <http://www.xadqw.cn>  
 刊 号 陕新出连内印字第00016号